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 年 1 月 31 日创刊 2014 年 6 月 30 日第 35 期

本期目录

〔重庆武斗专辑〕

生逢乱世

何 蜀 为了不应忘却的 27 个同学

蒋国辉 在“为毛主席而战”的日子里

秋 雨 “八二八”惊魂

从 闻 血腥岁月的一页——潘家坪战斗亲历记

牟 群 血色残忆

刘世秀 河街居民遭遇“八八海战”

昨日心迹

黄顺义提供 庞国义录入 一个痛失爱子的父亲的日记

编读往来

阎长贵谈 34 期金春明文章

蒋健对 34 期金春明文中一处提法的商榷

晓星谈 34 期金春明文章

〔重庆武斗专辑〕

说明：重庆的文革，以大规模武斗著称于世。1968 年 3 月 15 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接见四川及重庆军政领导人时所作的那个“中央首长三一五指示”中，周恩来说：“主席许多小报都看了。重庆八一五的《大局已定，八一五必胜》，主席说叫反到底派批的一塌糊涂，还有什么《嘉陵江上烟云滚滚》，主席都看了。”可见毛泽东对重庆的武斗规模及惨状了如指掌。因深谙上意，所以江青在提到重庆武斗时轻描淡写地说：“败家子，不管怎样是败家子。不过打一打也好，练习练习。”康生则说：“可以改进技术。”至于投身武斗的热血青年

和未参加武斗的无辜百姓冤死了多少人，在他们眼里根本无足轻重。他们要的只是“全面专政”的“全面胜利”。

本期选发了几篇当年不同角度的亲历者的回忆。希望有更多的亲历者能提供自己的回忆或相关史料。

【生逢乱世】

为了不应忘却的 27 个同学

何 蜀

—

2000 年，高级工程师黄顺义从华为电子设备厂动力研究所（在重庆市北碚区）办理了内部退休手续（2002 年底正式退休）。当时一些单位听说后急忙来找他联系，要聘用他去任职，有的还许以高薪，但都被他拒绝了。

他不是不想再多挣些钱，他也不是想要退下来去打牌、跳舞、旅游消闲……而是有一项他久已酝酿的计划想要完成。这个计划已经郁积于心多年，经常使得他心神不宁，寝食难安。

他要搜集 27 个同学的资料。

这 27 个同学，是文化大革命武斗中的死者，夭折于“无产阶级专政下”那场荒诞的“全面内战”中的 27 条青春生命。

他们是重庆大学学生——

采矿系 2 人：张全兴（采矿专业 68 级一班，22 岁），张显明（采矿专业 70 级三班，21 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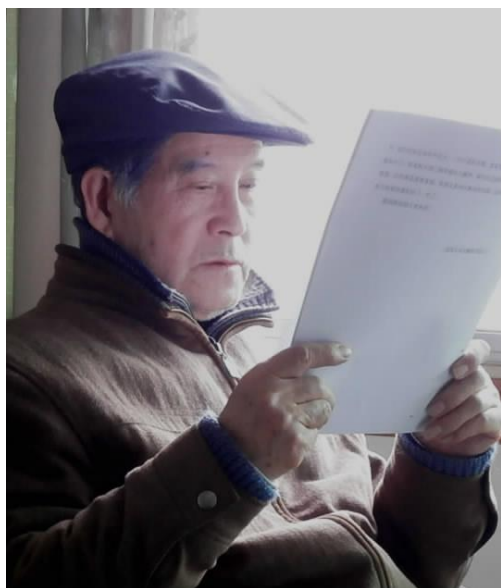
动力系 2 人：李德扬（69 级一班，22 岁），高维命（热能专业 70 级一班，21 岁）；

无线电系 3 人：谢宗正（自动控制专业 68 级四班，23 岁），黄文田（70 级二班，21 岁），董继平（69 级一班，终年不详）；

冶金系 9 人：辜习荣（钢铁冶金专业炼钢专门化 67 级二班，23 岁），陈茂明（钢铁专业 68 级三班，22 岁），何孝柱（钢铁专业 68 级三班，22 岁），谭荣坤（钢压专业 68 级，22 岁），赵厚忠（金热专业 68 级二班，23 岁），萧在光（68 级钢压班，22 岁），尹全信（68 级钢压班，22 岁），陈蕴健（钢压专业 70 级一班，21 岁），吴中和（钢压专业 70 级一班，21 岁）；

机械系 11 人：温栋梁（机冶专业 66 级二班，24 岁），段亚伟（机铸专业 67

级一班，23岁），刘文举（机造专业67级二班，21岁），苏裕发（机压专业67级二班，23岁），唐世轩（机造专业68级四班，22岁），张贤清（机造专业69级四班，22岁），李昌学（机造专业69级四班，22岁），岳泽民（机造专业69级四班，22岁），李盛品（机造专业70级四班，21岁），杨兴格（70级，21岁），冯纵（70级，21岁）。



黄顺义（左图为近照）当年是重庆大学电机系电力专业67级一班学生，那27个同学，既不与他同班，也不与他同系、同专业。他为什么一心要为这些同学搜集资料？

他曾经是这些同学的“勤务员”。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产业工人家庭出身的黄顺义，成为工作组指示全校师生“民主选举”的校文革筹备委员会成员。重大学生起来造反的“八一五”事件发生时，他与同学们站在一起，并以校“文革筹”成员的身份前去市委，强烈要求市委领导人出来与学生对话。重庆大学的造反组织八一五战斗团成立时的筹备会上，黄顺义被推选为团长，后来按照当时流行的做法，群众组织的领导人一律称“勤务员”（以示遵循“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当人民的勤务员”的官方说教），黄顺义也不再叫团长而改称勤务员。他这个勤务员可真是名副其实的勤务员，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为大家服务，被同学们称作“老黄牛”。在那大动乱的年代里，他除了1966年9月初参加率领同学上京告状那一次外，基本上都呆在学校主持工作。校党委和行政领导都被打倒或靠边接受审查以后，他就是校内的实际主管，特别是在重庆大规模武斗期间，他在学校料理各种烦杂事务，为应付各种突发事件日夜操劳，八一五派组织从各处送来的武斗死者尸体（包括他那二十几个同学中的大多数和其他一些单位的），都是他亲自组织人去处理、安葬的。死者们那些悲痛欲绝的亲属，也都是他参与接待和安抚的。那些日子里他真可以说是废寝忘食，殚精竭虑……

1968年11月，本应毕业分配的黄顺义被四川省革委会副主任、主管大学毕业生分配工作的张西挺点名“暂缓分配”，由军、工宣队送进了“说清问题学习班”，要他“说清楚”的问题是二个：一、被李井泉收买；二、反刘、张（省领导中的刘结挺和张西挺夫妇）。前一项罪名完全是诬蔑不实之词——经济收买吗？李井泉没有给过黄顺义一分钱，反而是李井泉被抓到重大接受批判审查期

间，黄顺义费了许多心思派人照顾其生活，保护其安全（因为国务院办公厅来电话提出了严格要求）；政治收买吗？李井泉在 1966 年 8 月接见重大学生领袖时确实说过一句讨好学生的话，称重大学生声援师专学生的“八一五事件”就像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一样……黄顺义当即顶撞道：“这个比喻可能不大恰当。我们只是学生，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起来参加文革……不能与十月革命相提并论。”至于第二项罪名，现在来看就不但不是“过”反而应是“功”了，因为在要黄顺义“说清楚”的一年之后，刘、张夫妇就被中央定为大乱四川的野心家、阴谋家拉下马，以后又成了锒铛入狱的“反革命”……

学习班关了几个月后终于获准毕业。1969 年 2 月，黄顺义被分配到昆明市送变电工程处。一年后，他申请照顾家庭关系调回重庆，在位于北碚区、生产汽油发电机的 6905 厂工作。在文革结束后的“清查”运动中，作为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的著名头头，他肯定是“罪责难逃”，属于重点清查对象。后来他被定为“三种人”（这也是一个永载史册的荒唐罪名）。实际上，他既没有搞过打砸抢，也没有在省、市新政权里任过一官半职，根本说不上追随谁“起家”。他和许多文革造反派一样，忠心追随的是毛泽东，却非但没有“起家”，反而遭到“剥夺入党、当官权利终生”的处罚。他们那一代大学生，都是虔诚地把共产党视为自己政治上的“母亲”的，按黄顺义的说法，想不到自己跟着“母亲”犯了错误，最后却被“母亲”打得遍体鳞伤，骂得晕头转向……

不过，黄顺义是个没有政治野心的人。对自己的个人遭遇他并不太纠结于心，他更揪心的是死于武斗中的那些同学，特别是在建于重大校园里的那二十几个同学的墓地被平毁以后，他更是痛心疾首耿耿于怀。面对一些人竭力抹掉历史记忆的做法，他有了一个越来越强烈的念头：不能让后人忘记这些同学。他要搜集他们的资料留给历史。

二

重庆造反派本来统称为八一五派，这样“史无前例”的群众组织之间，自然一开始就有些不同意见的分歧，正式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是“一月革命”夺权的结果（这一点在许多地方都一样）。毛泽东号召夺权，却并未明确符合什么条件的当权派才能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才应该夺权，夺权具体应该如何操作也从无明示……如此重大的行动，居然就这样极不负责任地发动起来了。于是各地群众组织只有按照当时媒体宣传中的一些调子去揣摩上意，自行其是。不同的理解，不同的打算，必然就导致夺权中的混乱与冲突。重庆夺权中，以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为首的大部分造反派在奉命“支左”的军队支持下建立

起临时权力机构“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革联会”），另一部分造反派则没有参加（或是参加后又退出，或是想参加却被排斥在外，或是一开始就拒绝参加），他们认为这是“假夺权”，是“黑市委”让权，“革联会”是大杂烩……双方互不相让，上纲上线，夺权一方认定革联会是“一月革命的伟大成果”，你攻击革联会就是反对“一月革命”，就是反革命，就要坚决镇压；而反对派则认为这个新生政权居然镇压造反派，打击造反派就是打击文化大革命，革联会已经堕落成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工具”，必须坚决砸烂……于是，原来的八一五派中就分裂出了一个砸派，后来改称反到底派。

1967年5月，中共中央相继发布了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即“红十条”）和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即“红五条”），让前段时间被打成“反革命”的砸派得到平反，同时要求两派团结起来共同对敌（这个“敌”指前市委书记任白戈“及其一小撮同伙”）。但是，中央的“红五条”有意回避了重庆两派矛盾的焦点——革联会问题。中央不提革联会，砸派欢欣鼓舞，认为是“宣判了革联会的死刑”，但中央又任命支持八一五派的驻军领导人组成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驻军领导人一再向八一五派表明坚决支持的态度，八一五派自然也欢欣鼓舞，相信革筹组只是革联会改了个名字而已，实权仍在自己一边……

在毛泽东长期灌输的“斗争哲学”亦即“仇恨哲学”、“整人哲学”的主导下，人们都坚信“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这使得两派在争论中都不会妥协，不会宽容，一定要把对方打成“反革命”才能证明自己的革命，决不容许“毒草”自由泛滥，只要认为对方的观点是“毒草”，就不能听任其“放毒”，于是互相撕大字报，砸广播车、广播站，这就必然引起打架斗殴。短短两三个月内，重庆两派的武斗就经历了历史上几百年几千年间从最原始的拳头、棍棒到钢钎、大刀再到真枪实弹的战争演变，终于在1967年7月底升级为枪炮齐鸣的“全面内战”。

三

张全兴和唐世轩，是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最早死于武斗的两个学生。他们是在两派第一次真枪实弹的大规模武斗——1967年7月25日八一五派攻打重庆工业学校的武斗中身亡的。

当时重庆大学位于沙坪坝区，该区基本上由八一五派控制。从该区进城（到市中区）有两条公路，一条从长江与嘉陵江之间的山梁上蜿蜒经过石桥铺、大坪、鹅岭等地，路途较长；一条从嘉陵江边的嘉陵路经小龙坎、化龙桥、李子坝等地。路途较短。重庆工业学校就位于化龙桥公路旁山坡上，该校的反到底派红岩兵团

是化龙桥地区反到底派主力，因其扼守着这条主要公路的中部，对八一五派形成极大威胁，加上该校武斗人员经常在公路上设卡检查过往行人，骚扰八一五派游行队伍，甚至拦截、抓捕八一五派人员和扣押车辆，早已成为八一五派必欲拔除而后快的眼中钉。早在1967年6月份，以重大学生周家瑜为首的革联会武卫司令部就制定了拔除工业校“钉子”的作战计划，原定6月18号开始行动，但因指挥联络方面的一些问题，计划搁浅。到了武汉“七二〇”事件后，八一五派拥护中央决定、声讨陈再道的游行队伍在化龙桥又遭到工业校红岩兵团的袭扰，随后又有八一五派被红岩兵团抓人、扣车，就引爆了这场大武斗。

7月24日夜，由八一五派武斗负责人阳增泰（军工企业八一五派统一组织八一兵团的“一号勤务员”）指挥各路人马对工业校形成三面包围，25日凌晨2时发起进攻。来自几个军工厂的八一兵团和几所中学、中专校的武斗人员近千人，以钢钎、大刀为主，并使用了轻重机枪、冲锋枪、小口径步枪及手榴弹、自制燃烧筒、燃烧瓶等武器，向工业校展开攻击，但因进攻者不辨校内虚实，担心埋有地雷，不敢贸然冲进校内。僵持至天亮后，阳增泰看到工业校有人陆续外逃，认为已经达到了吓跑该校人员的目的，加上他打电话要求增援的队伍迟迟不来，到9点钟时他下令撤退。已经撤走部分人员了，以重大八一五专事校外武斗的“301部队”为主的沙坪坝区增援队伍几百人才开到，又重新组织进攻。

就在这次重新进攻中，重大“301部队”的张全兴和八一五总团摄影记者唐世轩先后中弹身亡。加上此前的进攻中，江陵厂八一兵团一个青年工人身背几支以日光灯管自制的燃烧筒爆炸，严重烧伤后医治无效身亡，八一五派共死亡三人。反到底派则被自制燃烧瓶掷到身上烧死一人，中弹身亡六人（七人都是中学生，其中一人是幼儿师范的女生）。

这一仗，重庆两派武斗升级为动用枪支作战，“七二五”事件成为重庆文革史上一个标志性的转折点。

四

在武斗中，还有一些人不是死在战场上，而是在自制武器时失事或枪走火身亡的。重大死难学生中这两种情况都有：温栋梁文革前是校文工团二胡演奏员，他在1968年1月外出宣传演出时，在住地被楼下武斗人员枪走火射穿木楼板击中腹部，送到医院后又遇停电，未能及时救治，不幸身亡；李盛品则是在试制手榴弹时失事身亡的。据重大学生、《8·15战报》主编周孜仁回忆：

李盛品，川北山区考来的农村孩子，喜欢梳偏分头，一看便是那种很土却非

常乖巧的好后生。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日出版的战报第三十五期几乎用了一个整版刊登关于他的文章，计有：八一五总团追认唐世轩、张全兴、李盛品三人为“优秀红卫兵、模范八一五战士的决定”，有李的生平事迹简介，有悼念文章一篇、悼词五则、评论：“无私才能无畏”等。但我始终想不起为什么偏偏没有登他的照片？那张梳偏分头的照片绝对是送到我们编辑部的，我记得特别清楚。当然，给人印象更深的是发表在同一版的李盛品日记摘抄：“青年英雄的壮丽史诗”，和“李盛品烈士给一位朋友的遗书”。这封遗书，实际上是他死前写给他女朋友的情书。当年大学生忌讳谈恋爱，所以我们发表时在文字上做了技术处理：把“女”字删了。该情书是武斗刚开始时写的，还来不及寄出他便死了。他在信中无限深情地回忆了旧社会他家所受过大苦大难，结论道：“如果没有祖国的前途，一切所谓个人的前途都是骗人的鬼话”，因此，他对女友说：“阶级敌人随时在梦想变天，我们怎能睡大觉？……现在的问题是将文化革命进行到底还是夭折的问题。毛主席早已下了决心，要把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现在是决战时刻，是关键，我们一定要努力奋斗，不怕牺牲”。他告诉女友，“为了制止武斗，宣传群众，掌握斗争大方向”，他将到一个“比较危险的”地区去。他没有告诉她去做什么。同学们可是知道的，就是去辅导中学生使用重大的自制土手榴弹。对于本校产品的质量：引爆时间，他是非常清楚的，因此在进行演示时，他让中学生躲得远远的，自个儿拉掉引信，然后将手榴弹握在手上测算投弹的最佳延迟时间。不幸的是，他试验的这一颗，引爆时间恰恰很短。他粉身碎骨了。在那封来不及发出的信中，他这样写道：“我若有什么不幸，希不要把消息告诉家里人，如果我妈知道了我遇不幸，她肯定也不会再活下去了。你若有空，希到我家去玩，以免除家里人的怀疑。他们若问到我，你可编些话来回答，注意不要前言不搭后语，要先想好。你得消息后，要说不难过那是假的，我只希你不要伤心过度就行了，不要影响身体健康，要想开些，我对得起党和毛主席对我的培养，没有辜负他老人家，我想，你只要想到这一点，可能心里就会开朗些。”信在刊登之前，曾用大字报的形式先行公布在九宿舍门前，这个故事和抗美援朝时著名作家李准写那个关于志愿军给妻子写信的小说几乎完全一样，让所有读者都感动不已。在大家的一致要求下，总团专门派车派人在连天炮火中把他母亲和女友从遥远山区接来学校参加了追悼会。一老一少两个不幸的女人来到学校，当天我就赶去看望了：老母亲一直扑在学生宿舍的桌子上痛哭不止，整整一下午都没抬起过头。我只能看见一部散乱的苍苍白发，那么耀眼而摄人心魄！（《红卫兵小报主编自述》225—227页，美国，溪流出版社，2006年）

五

在重庆当时的军工厂中，生产步枪的建设机床厂和生产坦克、装甲车的空气压缩机厂都在九龙坡区的杨家坪。建设厂被反到底派抢先控制，该厂生产的半自动步枪从1967年7月底即开始向反到底派武斗人员发放。八一五派为了争夺建设厂以拿到枪支，8月1日，周家瑜、阳增泰等在革联会作战司令部研究决定集中力量攻打建设厂。但是因原定带路的建设厂向导怕事溜走，各路武斗人马集中到杨家坪后无人带路，空压厂的八一兵团便乘机将队伍拉到该厂去，打跑该厂反到底派，占领全厂，控制了该厂生产的坦克。

重大八一五的“301部队”为了能得到空压厂支援的枪支，也派出人员参加了空压厂之战。重大学生在向该厂医院和水塔一线进攻时被打死谢宗正、陈茂明、张显明三人，重伤董继平（致残多年后死亡），遭受了武斗以来最大的损失。也因为这一损失，导致八一五派占领全厂后发生了枪杀反到底派俘虏泄愤的恶性事件。重大“301部队”负责人梁文福文革后曾为此被关押审查多年。

在杨家坪地区这次大规模武斗中，重庆大学还死了两个本来不是作战人员的学生，一个是反到底派重大井冈山公社驻市中区联络站的赵厚忠，另一个是八一五战斗团动力分团驻杨家坪联络站的李德扬。

赵厚忠因送资料到建设厂，被反到底派留下参加“建设厂保卫战”，1967年8月5日，在武斗中被身后飞来流弹击中头部身亡。

李德扬，1967年8月3日在杨家坪电影院附近梅堡制高点掩护其他人撤退，被子弹击中颈动脉，失血过多身亡。

六

除李德扬外，还有一个同样是因掩护别人撤退而身亡的重大学生，他是反到底派重大井冈山公社成员辜习荣。

死于武斗的27个重庆大学学生中，大多是共青团员，辜习荣是其中唯一的中共预备党员。他文革前是校武术队的队员。文革中两派分裂后成为反到底派。1967年8月13日死于嘉陵机器厂。

生产机枪子弹的嘉陵机器厂是当时重庆十大军工厂之一，位于沙坪坝双碑。1967年两派武斗开始后，该厂反到底派力量较强，占领了厂生产区，八一五派则据守厂家属区一部分和职工医院。8月9日，八一五派革联会作战司令部决定攻打嘉陵厂。会议推选重大八一五总团勤务员、重大“301部队”政委吴庆举为攻打嘉陵厂的总指挥。前线指挥部设于邻近嘉陵厂的102钢厂（即特殊钢厂）。

八一五派的攻击部队于8月12日深夜部署完毕，13日拂晓发起总攻。因反

到底派防守火力很强，八一五派伤亡大，进展小。吴庆举下令调来三辆坦克作前锋，终于拿下进厂大门左侧制高点。随后又拿下厂内水塔制高点，逐步向厂内其他地区推进。反到底派军工井冈山嘉陵兵团的武斗指挥李鲁沂此前已经率部分武斗骨干随邓长春的“舰队”去了杨家坪，厂内防守人员虽然武器好，但势单力薄，在八一五派的猛烈攻击下难以抵挡，不得不从厂后山下抢渡嘉陵江撤往对岸江北区，那里是反到底派的“解放区”。

当时人数很少的重大井冈山公社无法在校内立足，人员流亡在外，有十几个同学住在嘉陵厂，撤退时他们都跟着军工嘉陵兵团一起撤退了，只有辜习荣（下图为遗像）留了下来。最后看到辜习荣的是嘉陵厂工人、嘉陵兵团成员杨维富，转业的前解放军部队“五好战士”。杨维富正要到厂后的制高点挂榜山上去掩护大家撤退，那山上有抗日战争时期留下的防空工事、战壕。杨维富告诉笔者：“辜习荣是替我死的，本来应该是我死在那里。”当时辜习荣对他说：“你是工人，还要为国家创造财富，你赶快撤，我来掩护。”杨维富不听他的，认为自己是转业军人，应该由自己来打掩护，坚持要上山去，辜习荣见劝说无效，便用枪指着他，逼他撤走，杨维富相信他不会开枪，继续往山上走，辜习荣情急中掉转枪口指着自已的头说：“你不走我就打死自己！”杨维富见他态度如此强硬，只好撤走了。



辜习荣独自在挂榜山上以一挺“127”高射机枪（发射 12.7 毫米口径子弹）和几支半自动步枪掩护大家撤退。最后在进攻者密集的火力中受伤，被包围上来的八一五派三十二中“四野”的学生乱枪齐发，身中七弹身亡。

这次武斗，死伤上百人，八一五派胜利攻占全厂。担任前线总指挥的吴庆举，文革前是重庆大学机械系机冶专业 67 级 2 班学生，校文工团乐队队长（二胡演奏员）。他不知道，在他指挥的进攻枪炮中倒下的反到底派人员里，有一个是他的校友。

七

1967 年 8 月 18 日，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一周年的日子，重庆武斗中最惨烈的恶战爆发：八一五派由重大无线电系学生、八一五总团勤务员秦安全任总指挥，向潘家坪高干招待所至大坪一线的反到底派据点发起总攻，两派展开大规模

武斗，使用了榴弹炮、三七炮、高射机枪、坦克等重武器，死上百人，重庆河运学校、重庆医学院、潘家坪高干招待所等多处房屋被打坏，邮电器材厂一幢宿舍被八一五派炸毁，仅潘家坪高干招待所房屋和设备损失即达 400 余万元。

重大学生高维命就在潘家坪之战的第一天中弹身亡。

为配合大坪、潘家坪地区的这场武斗，八一五派另一路人马向九龙坡区黄葛坪王家大山发起进攻。那里有反到底派中学生红卫兵九一纵队的两支劲旅——电力学校东方红和电力技工学校井冈山。电校东方红有学生创作了一首《中学生红卫兵九一纵队战歌》，从歌词中可看出当年这些中学生们的思想状态：

炮声隆，枪声激，风烟滚卷战旗。

啊，“九一”战士浴血奋战，所向披靡全无敌！

烈士血，染红旗，流血牺牲志不移。

“九一”战士心向党，誓死保卫毛主席！

前进，前进，前进，前进！踏着烈士的血迹勇敢前进！

踏着烈士的血迹前进，前进，前进！

为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九一纵队”誓与牛鬼蛇神狐群狗党决一死战！
决一死战！决一死战！

（口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电校与电技校两校背靠王家大山。八一五派于拂晓突袭攻占了王家大山制高点，消灭了在山上驻防的五个反到底派人员，其中包括军工井冈山嘉陵兵团负责人、“舰队”副司令李鲁沂和电力技工学校井冈山作战部长徐其祥——据后来打扫战场时检查遗体 and 遗物情况分析，他们是在子弹打完后被包围上来的八一五派枪杀的。这就激发了反到底派此后报复性的两起杀俘事件：军工井冈山负责人、“舰队”司令邓长春在“反到底一号”舰艇上为李鲁沂召开追悼会时，下令枪毙了两个八一五派俘虏（其实其中一人只是被怀疑为八一五派）；反到底派黄葛坪地区指挥部则为给王家大山死难“战友”复仇，在九龙坡江边趸船上由电技校和电校学生执刑，用太平斧斧背砸头的残忍方式杀害了四个八一五派俘虏……

当八一五派攻占王家大山那天清晨，反到底派立即组织人马反攻。两派激战中死数十人。重大八一五“301 部队”参战的三三、三四、三五、三七纵队在这次战斗中死亡 10 人（刘文举、何孝柱、萧在光、尹全信、陈蕴健、吴中和、杨兴格、岳泽民、李昌学、段亚伟），这是重大八一五在武斗中损失最惨重的一次。

其中，段亚伟在王家大山激战中本来未死，但在被俘时拒绝举手投降，还倔强地说：“八一五战士没有投降的习惯！”被当场开枪打死。

据周孜仁回忆：

段亚伟死后的情况我也至今记得清楚。同学们在广场上为他开了一个追悼会，并且把他的父亲和母亲也请了来。父母亲好像都是教师，而且好像也只有这样一个儿子，茹苦含辛，好容易拉扯大。可以想象，儿子的死让他们何其悲苦！但是发言的母亲在会上没有像来自山区的李盛品母亲那样泣不成声，而更多些知识妇女的理性。母亲的发言是这样说的：

“我失去了亲密的战友，心爱的儿子，内心是非常悲痛的。但是我感到骄傲，因为培养子女的目的是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斗争。”

她发言时的悲苦和庄严让我想起德国版画家珂勒惠支那幅有名的《牺牲》：可怜的母亲用树枝一样枯瘦的手臂将自己的孩子无助地举向上苍。我们在《战报》第四十三期刊登了追悼会的消息。时间是一九六七年十月九日。我想不起为什么这么晚才对他进行追悼？是不是一直没有能找到他的尸体？大字报为他出了纪念专栏。我们把他母亲发言中关于为共产党培养了一个好儿子而骄傲这句话，写成了通栏大标语。



几十年后，我读到了德国“废墟文学”的代表人物伯尔的许多作品。作品中所表现出的毁灭、忏悔和沉思，让我深深震动。现在我已不知道两位可敬的父亲母亲身在何方？如果还健在，我真想再见一见他们，和他们一起平静地讨论一下发生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故事。因为很久以来，我都想把段亚伟和他母亲的故事写下来，我相信这个故事会和伯尔的故事一样动人心魄。

（左图：段亚伟遗像。）

“九五命令”下达，两派停火交枪后，10月初，黄顺义派专门在校负责尸体收殓、被同学们戏称为“尸长”的同班同学郑志胜，带着几个死难同学的亲属，前去王家大山收殓尸骨，郑志胜寻访当地农民，听他们指点哪儿有一具什么尸体（因天气太热，尸体发臭，有的已由农民草草就地浅埋），农民还介绍了当时他们躲在屋里偷看到的哪个人是怎么死的等情况。郑志胜根据一些当事人和农民的讲述得知：杨兴格在撤退时和另一位机枪手自告奋勇，掩护其余同学和红农八一五人员抬着四个伤员撤退。杨兴格二人借山上农民一个已干涸的粪坑作掩体，压住“红色火车头”（铁路局的反到底派组织）的凶猛火力，杨兴格见子弹快打完

了，叫身边战友撤走，他一人压上了最后一匣子弹。那个机枪手刚起身要走，就被对方子弹击倒。杨兴格的子弹很快也打完了。“红色火车头”打头阵的两人枪口喷着火舌，猫着腰向他逼近，杨兴格一跃而起，拿着枪管将其中一人拦腰打倒，另一人一梭子弹扫来，杨兴格倒在血泊中……

郑志胜特别感慨地回忆了杨兴格的父亲收殓儿子尸骨的情景：

杨兴格的父亲不要我们插手，特别是不准何开泰（被安排协助郑志胜收殓尸体的反到底派俘虏）插手。他说：“是我儿子的尸骨，我要亲自收。”杨父，四川内江机务段铁路工人，中等身材，年近半百，方方正正的脸庞，油黑发亮的皮肤，上穿红色T恤衫，用皮带扎在一条蓝色军干裤里，声音宏亮，挺有阳刚之气。尸体早已干枯，只剩下衣服包着一堆白骨。杨父没有眼泪，哽咽着声音说：“兴格，你是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死的，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儿子，父亲为你感到骄傲，你为父母争了光，你就安心地去吧！”我为杨父摊开一段白绸，让他把儿子的白骨，一根一根地用手捡起来放在白绸上包好。他亲自抱在怀里，好像抱着儿子安然入睡。让我想到兴格小时候，杨父抱着儿子呀呀学语的情景。我眼睛也湿润了，喉头发哽。二十多年的辛勤抚育，得到的只是一包白骨，几句“伟大、光荣”虚幻的精神麻醉剂。（郑志胜回忆录，未刊稿）



（上图：1967年10月重大八一五战斗团“301部队”部分成员与死难同学家属合影。）

在死于武斗的这 27 个同学中，董继平是最后一个死去的，他在 1967 年 8 月 2 日参加空压厂武斗时受重伤——在冲锋中钢盔被打掉，头部中弹，脑浆迸出。送医院抢救后，经一个多月精心治疗和护理，恢复知觉，但右半身瘫痪。生活不能完全自理。

当时，董继平被同学们视为身边的英雄，在《8·15 战报》第 42 期（1967 年 10 月 1 日出版）发表的《毛泽东思想的一曲凯歌/记我们身边的麦贤得——董继平同志》报道中，对他的“英雄事迹”作了如下记载：

阳光雨露育青松，毛泽东时代出英雄。我们怀着无限激动的心情，给大家介绍我们身边的麦贤得，他就是重大 8·15，六·一八分团优秀的红卫兵战士硬骨头董继平同志。

董继平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硬骨头精神，不仅表现在自卫的战场上，而且表现在医院里。在八月初旬的一次保卫空压厂的战斗中，他为了掩护战友不幸头部中弹，脑浆迸出，在生命垂危的紧急关头，他被战友送进××医院。

在医院的很多天中，他一直处于休克状态，不能吃饭，只能从鼻腔里打点葡萄糖针，呼吸困难，只好在他的喉头侧面开个小口帮助呼吸。他右半身瘫痪了，右手也瘫痪了……但这一切，没有吓倒这位英雄的 8·15 战士，这位我们身边的麦贤得式的英雄。他以极大的毅力，战胜了伤口的疼痛。他在神志十分模糊的情况下，他仍能记得我重大八·一五，英雄的 301 战士的光荣任务——誓死保卫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随时准备给来犯的一小撮坏家伙以沉重打击。当他第一次睁开眼睛不久，他就能用唯一能活动的左手比出一个“三”，这是他对人们的一切问话和社会上一切现象的唯一反应，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位无畏的战士，在几个月用生命和鲜血保卫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战斗中，对我重大 8·15 的骄傲——英雄的 301 部队有着何等深厚的阶级感情！

当他精神好时，常用唯一能动的左手给来看望他的战友、同学、亲人写“毛主席万岁”！“8·15，301”，他性格无比坚韧刚强，一次西交大一同学写给他的一封信，他固执地用他自己的左手去拿出来看，而不许人帮忙。为了早日返回战斗岗位，他忍痛进行着顽强的锻炼，他常常用唯一能动的左手去帮助瘫痪的右手活动，他在敌人面前是胜利者，在创伤面前也是胜利者。

……当我们去看他，喊“毛主席万岁”这个口号时，他万分激动地举起创伤的手并翘起大拇指，当我们讲到刘少奇、王光美时，他马上比起小指拇。看这是何等高尚的感情！何等鲜明的爱憎啊！

此文把董继平称为“我们身边的麦贤得”，在当时是很自然的事。麦贤得是

文革前夕 1965 年“八六海战”中解放军海军 611 艇的轮机兵，在战斗中头部被弹片击中，失去知觉。苏醒后以惊人毅力顽强坚守在主机旁，事后被授予“战斗英雄”称号，其事迹几乎家喻户晓，成为广大青少年崇拜的偶像。从有关董继平的这一则报道也可以看出武斗人员的思想与文革前革命传统教育之间的关系。

当同学们都毕业分配离校后，董继平再也无人照料，被工宣队和革委会遣送回四川省新津县农村老家。据说他在家乡靠乞讨和捡拾垃圾度日，最后倒在家乡土地上。死亡时间不详。

九

1967 年“九五”命令下达，大规模武斗暂时停息，重大八一五战斗团在校内松林坡修建了一座“烈士陵园”，除去刘文举的遗体已被他父母接回北碚天府煤矿老家安葬外，这座陵园里安葬了先后死于 1967、1968 年武斗中的 24 个同学。陵园里没有董继平，当然也没有反到底派的赵厚忠、辜习荣。

文革结束以后，在“彻底否定文革”被一些人变成“彻底抹掉文革记忆”的时候，陵园被无情地平毁了。周孜仁回忆：

一九九二年，我因生意上的事情回到母校，下榻于松林坡外宾招待所。面前——我发现正好就是当年的墓地：只是现在已变成了招待所前的水池，半亩横塘，里面落满了残叶和暗淡的天光。我问刚刚成年的宾馆服务员：

“这儿曾经打过仗。你相信吗？”

天真烂漫的女孩拼命地摇头。

“这儿曾经炮弹满天飞，一晚上打几百发炮弹，你相信吗？”

还是摇头，她的眼睛瞪得大大的。

于是我说了，这些都是真的，而且，就是在这儿，在现在水池这个位置，埋了好多好多死人，和你差不多，都是二十左右的年轻人！冤死的大学生！

这一次，她真地吓坏了，吓得跑进屋里不敢出来。

近年来，黄顺义每到清明节扫墓时，都要约上几个同学和死难同学的亲属，先到沙坪公园那一处文革死难者墓园去，然后再到母校重大那一处曾经的“烈士陵园”旧址，把他千辛万苦搜寻来的二十几个同学（现在已经搜集到二十二人的照片摆在草地上，进行无墓可扫的祭扫活动，表达对死难同学的哀思。

他始终想不通的是，为什么那个“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的人，死后可以在专门的纪念堂里安享人们的膜拜，而这些在领袖号召下献出了青春生命

的同学们却死无葬身之地？

著名电视编剧、原重庆市二十九中学生张鲁，在《红卫兵武斗忏悔录》一文中，为他们学校那些死于武斗的同学发出这样的感叹：

倒回去二十年，他不就是陈然、邱少云、黄继光？

倒回去五十年，他不就是秋瑾、林觉民、谭嗣同？

倒回去千百年，他不就是田横荆轲文天祥？

杀身成仁，舍身救人，以身殉国，舍生取义……

本民族一脉相传的精神基因，他们都如此忠实地继承了，可他们却只能是孙渝楼，只能是张光耀，只能是余志强，只能是欧家荣，只能是崔佩芬、唐明渝，只能是……

……

你们生不逢时？死得不值？生错了？死错了？

你们才刚刚 16 岁 18 岁 20 岁啊……

周孜仁在《关于另一类文革受难者的思考》一文中，谈到这些文革武斗的死难者时说：

他们有工人、平民、学生，有的甚至是尚未成年、或者刚刚成年的少男少女。他们没有被尊敬过，没有任何值得骄傲的阅历，而他们恰恰是想为国家和民族创造奇迹和功勋的人。他们正是怀揣着在壮丽革命背景下创造一段让人羡慕的个人历史，而愚蠢地、真诚地，义无反顾地走向了死亡。这一大批人，也应属于文革的受难者。

……

毫无疑问，他们也是文革的受难者。他们不应该被忘记。而且，他们的死是显得那么地多义，甚至过于复杂和畸形，所以记录、研究他们的死，除了表示对他们生命的尊重之外，从某种意义上说，也许更能找出文革的悲剧性所在。

黄顺义现在还在不断补充他这 27 个同学的资料，继续自己花钱复印、打印，自己花钱打长途电话寻找线索，自己辗转乘车、跑路去寻访可能的知情者或亲属……

我知道，还有不少像黄顺义这样的热心人在做着同样的工作。

通过他们默默无闻的努力，也许有一天，能够把一部分不同类型的文革死难者的资料留存下来，交给历史。也许有一天，我们也会有一处像犹太人纪念他们

在二战中的死难者那样的墙，刻上那些不同类型的文革死难者的名字……

2014 年 6 月 15 日改定于重庆凤江阁

【生逢乱世】

在“为毛主席而战”的日子里

蒋国辉

按：本篇节选自作者回忆录《一个中学生的文革记忆》。

作者蒋国辉，文革爆发时为西南师范学院附中初 66 级学生，在 1967 年两派武斗中是反到底派中学生红卫兵九一纵队北碚支队西师附中“布尔什维克”成员。后下乡到四川省苍溪县当知青。1972 年调重庆打通煤矿当工人。1977 年考入西南师范学院外语系。1982 年考入四川外语学院攻读硕士学位，毕业后在西师外语系任教。1987 年考入黑龙江大学俄语系攻读博士学位。90 年代初期出国到乌克兰，现定居德国。

从分裂到武斗

1966 年底，重庆的八一五派（当时是重庆造反派的统称）在各个领域势如破竹，大、中学校的保守派“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被群众称为“思想兵”）都已经纷纷倒戈。我步行串联回到重庆后，开始参加自文革以来真正有组织的“革命活动”。“思想兵”垮台以后，我们学校成立了形形色色的组织，其中有一个叫做“西师八三一战斗纵队附中分队”的组织，只有两三个人，都是我以前比较熟悉的、关系不错的高中学生，我就决定参加这个组织。这个组织最初没有什么自主的活动，一般都是跟着西师“八三一”的大学生们活动，写一些标语什么的。

没过多久就形势剧变，发生了“二月镇反”。重庆许多单位造反派组织的领头人物都被抓起来送进了监狱。西师“八三一”的几个风云人物被抓起来关进了北碚公安分局的看守所，还几次戴着手铐用囚车押回西师来批斗。当时的形势真是“黑云压城城欲摧”，我们都以为文化革命就这样结束了。在西师任教的父母（父亲在教育系，母亲在中文系，是 1952 年院系调整时从四川大学调来的）更是肯定这是 1957 年反右斗争的重现，坚决不同意我再去参加“八三一”的任何活动。但那时父母对子女的管束已经非常有限。我那时的心态，一是觉得悲愤，二是感到刺激。我以为自己赶上了小说中描写的与白色恐怖抗争的时代。于是经常瞒着父母，晚上和同学一起上街去贴抗议标语，参加辩论，为我们终于有机会

干“地下工作”而无比兴奋。不过，心里是没有底的，不知道文化大革命还会不会继续搞下去。

到了1967年4月，“二月镇反”变成了镇压革命小将的“二月逆流”遭到批判，被抓的造反派组织头头全部释放，被压垮的造反组织又大张旗鼓地恢复了活动，而且声势比以前更加浩大。

几乎同时，在全国所有的地方，都发生着大同小异的一件事，即“保皇派”垮台、造反派夺权以后，造反派又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斗争从辩论发展到拳脚相加，再到冷兵器肉搏，最后发展成为使用现代化武器的立体战争……重庆造反派夺权建立“革联会”后，也分裂成了两大派。我到现在也没弄清楚具体是什么原因，西师“八三一”作为重庆八一五派的元老，开始不满意“革联会”这个权力机构，要砸烂它。而另一些八一五派的元老则要保卫“新生红色政权”。由此，原来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成为两条不同战壕中的敌人，以西师“八三一”为代表的一方，自称为“砸派”，后来改称反到底。

我们学校的“八一五战斗队”本来是“思想兵”解散后最大的一个组织，此时也分裂了。一部分与原来也属八一五派的组织“无产者”合并；另一部分则与我们这个“八三一分队”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叫“布尔什维克”的组织。我们这个组织后来在武斗中被人称为“布娃娃”，意思是不经打。比较起来，“无产者”这个组织在武斗中则名声非常响亮，它的几个头头都是特别能战斗的“亡命之徒”，打起仗来冲锋在前，而且刺刀见红毫不手软，所以这个组织在北碚的八一五派中是一张王牌。我现在还是百思不得其解，“无产者”中有好多成员是西师的教师子女，还有不少是我同年级的同学。这些人在文革前都是斯斯文文的学生，可是加入了“无产者”这个组织后都变得跟以前判若两人。我亲眼看见参加了“无产者”的初三（四）班一个瘦弱的同学，提着一根大棒在校园里追打几个手无寸铁的女生。或许人的天性中真的都有被压抑着的残忍一面；或许像谚语所说的“一头狮子带领一群绵羊，就是一群狮子”。1967年8月初“无产者”的一号头头胡明富在攻打845厂时被枪弹击中身亡，同时身亡的还有另外两个头头潘万森、龚安模以及支队长谢淑萍……这个组织虽然没因此垮掉，但也元气大伤。

重新划分的两派，刚开始时只是写大字报互相攻击、辩论、游行等等，还跟文化大革命的“文化”二字沾着点边儿。后来就出现了骚扰和围困游行队伍，辩论中拉扯推搡对方等行为。1967年2月19日，两派在市中心大田湾体育场发生冲突，一开始，反到底派各个组织摇旗呐喊、高呼口号、散发传单，与对方争夺主席台上的高音喇叭，表达砸烂“革联会”革命到底的决心。整个场面就是我们想象中的“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的现代版或重新演绎，革命小将群情激愤、摆出了视死如归的阵势，场面显得十分悲壮。对立派也不是吃素的，他们

采取了坚决的“革命行动”，把这些“反革命的砸派”扔出会场去。

当时，我妹妹随她们学校十三中“九八战斗团”的队伍站在主席台右下方看台上，西师“八三一”在他们旁边。混战开始不久，一个“八三一”的女生在就要被“扔”出会场的时候，把一摞“八三一”的战报《红岩》报匆匆交给站在她旁边的我妹妹，只来得及喊了一句“小鬼，帮我保存好”，就从体育场的看台上消失了。我妹妹接过报纸的那一刻，满心悲愤，就像从即将奔赴刑场的英雄手中接过当年地下党重庆市委主办的《挺进报》一样，决心要把以前在书中读到的革命先烈前仆后继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运用到实际行动中，她用手里抱着的棉衣将报纸包起来，小心地抱着，保护着。就在她包裹报纸的时候，对方的工人已经盯上了她。她只听见有人说“这个，这个”，然后身体就悬空了，报纸撒了一地，她被扔下了看台。再往后，就是一片不绝于耳的骂声：“小反革命，滚出去！”“龟儿子人不大点儿，啥子没学会，就学会反革命了！”“格老子跑来造反，造你妈的反，滚！”从看台下的运动场一直到出口，由对方的人组成了一个人体通道，我妹妹一边挨骂，一边被推来搡去，几乎脚不沾地“滚”出了会场。到了体育场外，妹妹见到了自己组织里的高中同学，她压抑了半天的眼泪一下子井喷，拉着大同学的手泣不成声，像是历经千难万险终于找到了党组织的地下工作者。

后来，两派都开始了游行。我们的队伍从解放碑开始就被对方的人围攻骚扰，拉扯殴打，到上清寺不过一公里路，却走了五个多小时，才突出了对方的重重围困。妹妹后来说她在游行队伍中看见了我，当时我正在保卫我们组织的战旗，与对方撕扯着，高声呼喊，嗓子都已经嘶哑了。妹妹隔着人群看见了我，无比自豪地对旁边的同学说，那是我的哥哥！感觉上就像我是《红岩》中的成岗，而她就是成岗的妹妹成瑶。

还有一次，已经是在武斗的前夕，北碚的反到底派在体育场集会游行。走到人民会堂附近，“无产者”的成员突然冲进我们的队伍，抢走了我们的旗子，还亮出匕首来威吓驱赶游行队伍。

匕首的出现，标志着两派纷争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校园里只剩下了武斗人员

1967年4月底的一天晚上，十三中“九八”的武装人员到了我们学校，和我们“布尔什维克”的武装人员联合起来，把“无产者”围在附中图书馆的楼上。狂热的学生在几次进攻冲不上去的情况下，有人作了一个疯狂的决定——放火烧，说，楼上的“无产者”不投降，就把他们全部烧死！

幸好还没来得及放火，驻北碚的五十四军炮团派出的一连士兵就赶到了，好

似神兵天降，把“无产者”从绝望中解救了出来。士兵们强行将围攻的人驱散，用身体组成人墙把“无产者”保护起来送出了学校。“九八”和“布尔什维克”的战士们气得捶胸顿足，好些人跟在军人后边泼妇似地破口大骂，向人墙护卫着的“无产者”扔石头，甚至几次要冲破人墙去抓“无产者”的头头，但最后还是眼睁睁地看着训练有素的军人保护着“敌人”离开了战场。

如果不是重庆的驻军一边倒地支持八一五派；如果不是那天晚上军队把“无产者”的人员解救出去，北碚的武斗史可能就是另外一种写法。不过，现在回过头来冷静地想一想，那天晚上假如军队不介入，将有多少狂热而无辜的青少年学生要成为文革的牺牲品？！有的当时就会被无情的烈火烧死在楼上；有的则会在文革后期成为罪犯被关押甚至被枪毙。

大规模武斗初期，北碚区最轰动的是西师校园内发生的“六五——六八事件”。起因是“八三一”要将对立派“春雷”（“二月镇反”时成立的组织，其基本队伍是以前的“思想兵”）赶出他们据为总部的图书馆新大楼，乃至把“春雷”挤出西师。“春雷”坚决不离开，把大楼变成了他们的战斗堡垒在里面固守。“八三一”就用武力攻打。我们这些冲动的中学生就像充满气体的皮球，稍稍加一点外力就一蹦老高，所以很快就卷进了支持“八三一”的战斗，并且三下五除二利索地攻进了图书馆大楼。北碚其他八一五派的组织闻讯赶来声援“春雷”，反过来把夺占了图书馆大楼下边三层的我方人员包围在里面，一场血腥的战斗就这样发生了，双方都有不少人员不同程度地受伤。我现在已经忘了事件怎样结束的，好像是我们打败了。记得那几天晚上，我在一处楼顶上（不知是不是图书馆的副楼）守着一架探照灯，不停地扫描楼下的那些黑暗角落，防止敌方偷袭。有天晚上下雨，我去动探照灯时还被电打了一下。我们失守后，其他人怎么逃出去的我不清楚，我自己是仗着熟悉地形，从图书馆后边书库的窗口跳出去跑了。

当时我弟弟还是小孩子，他们一帮孩子去西师员工食堂打了饭，还在石阶梯上坐着观看双方的攻防。我妹妹当时在市第九人民医院当义务看护，送来的伤员两边都有，多数是被棍棒打击和石块砸伤的。妹妹在九院一直待到伤员们康复出院，才跟西南农学院的大学生一起到了西农。

最初的拳脚棍棒很快就遭到淘汰，取而代之的是钢钎，斗争进入了可以杀人致死的冷兵器时期。十三中的“九八战斗团”在这个冷兵器时期是“一朵耀眼的奇葩”。他们拼钢钎时采用古代的罗马兵团作战的方式：排成方阵，端着钢钎，喊着口令，一步一步逼近对方，再开始拼杀。其实真正拼杀的机会几乎没有，因为对方的人马见到这个阵势，往往不等他们走拢就掉头逃跑了。当时北碚盛传的“九八战斗团”最辉煌的一次胜利，是用这样的方阵打败了天府煤矿的“三一八兵团”。“三一八”和西师附中的“无产者”是北碚区八一五派搞武斗的中坚力量。

但是八一五派还是很快就占了上风。倒不是因为这一派的人真的不经打。主要是因为八一五派有驻军的支持。自从毛泽东发出指示，让军队参加文化大革命“支持左派”后，各地的驻军就开始有倾向地介入了当地的两派斗争。究竟谁是“左派”，根本无法辨别——都是拥护共产党，都在“保卫毛主席”，所谓“支左”，事实上是驻军领导持那一派观点，军队就支持那一派。结果，问题反而更加复杂化。毛泽东那时曾说，大乱才能达到大治，也许这是他运筹帷幄的一个策略。但是对于一个地方最现实的问题是，军队支持哪一派，哪一派就能在本地占上风掌权，重庆驻军五十四军支持八一五派，因此反到底派一直受压制。

在西师“六五——六八”事件中最后获胜的八一五派一度撤到嘉陵江对岸天府煤矿一带，但借着驻军的威风，整个北碚城区很快就被八一五派完全控制了，只有以西南师范学院为界通往青木关方向的大片地区（包括两所大学，两所部队院校和两座内迁的大型工厂以及广大农村），还在反到底派手里。对于我们来说，城区里是一片白色恐怖，我们一派基本无人敢独自前去，因为每个学校都分成了势不两立的两派组织，熟人太多，任何人进入对方控制的区域都有立即被“点水”（揭发其敌对身份）抓捕乃至丧失性命的可能，比解放前在白区的地下党还危险。

我们一派的中学生全都集中在西师。附中的人住在西师前院长兼党委书记张永清的家里。他们全家作为“走资派”不知被赶到什么地方住去了。张家是一楼一底的小洋楼，共五口人（院长的一个儿子张小羊是我小学同班同学）。我们二三十个人住进去，还没有占到楼上一半的房间。像这样的住房水平，现在西方发达国家也只有为数不多的上等中产阶级才享受得到。张永清是南下干部，行政级别为省级，与当时重庆市委书记同级。文革前这些人的家都“侯门深似海”，老百姓并不了解他们。文化大革命撩开了掩盖着他们的那层神秘面纱，让普通老百姓有机会看到他们特权阶层的真实生活。群众看到解放这么多年竟然还有与自己完全不同的“贵族”存在，自然怒火中烧，激发起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满腔仇恨，于是革命的劲头更加充足，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抛头颅、洒热血”更加在所不惜。

此时的西师已经十室九空。许多教职工都是从农村来的，武斗开始大打的时候，人们便纷纷跑回乡下老家或乡下亲戚家躲避去了。我们家没有农村亲戚，父母带着十岁的弟弟，在我们撤退到西师时还没有离开。我到西师后，甚至没有回家去看过一次，他们是什么时候离开的我也不知道。后来妹妹找到我，告知父母已经离开了家。他们离开西师时，校园里除了我们这些武斗人员，基本上没有其他人，他们再不走就会陷入危险，因为不久以后武斗升级，热兵器闪亮登场。

信仰驱使下的疯狂

我们撤退到西师后，经常有对立派的人来进攻骚扰，发生冲突最多的地方有两个：

一个是西师靠文星湾的校门一带。我的家就在那附近，幸好父母他们及时走了，不然会非常危险。有好几次，我们的人晚上在那一带巡夜，被对方从围墙外边用体育运动的小口径步枪击伤。我妹妹的一个同学，家住文星湾，一天她趴在围墙上向她家的方向探望，一颗小口径步枪子弹射过来，把她的手腕击穿了。

另一个地方是水岚垭——西师的另一个校门（如今的彩虹桥）附近。水岚垭是五十年代初修渝南公路时，将一座小山凿开而形成的一段峡谷，长约一百米，宽是一条两车道的公路。两边的峡壁呈九十度，直上直下。我上小学时，曾亲眼看见一个从陡壁上掉下来摔死的人。峡谷的一边是西师的校园，另一边有一些零星的民房。我们那时就在西师校园这一边的山上堆了很多乱石，准备对方来进攻时就从悬崖上砸下去。后来这些石头没有派上大用场，只有一次对方从对面的山上向我们这边扔石头，我们用这些石头进行了还击。用手扔石头威力有限，有人就想出了办法，将几指宽的橡皮筋绑在长条凳的两条腿上，做成大弹弓，可以将小皮球那么大的石头射到对面，我有一次用这种弹弓将对方用来做盾牌的门板也打断了，足见其威力不一般。

在西师驻留时，我做了一件至今使我良心不安的事，这件事情的发生是为了执行命令完成任务，确实不是出自我的主观愿望。

一天晚上，我和另外两三个人被派到重庆市第一师范学校去抓一个据说是“春雷”的“打手”。到一师要从被“无产者”盘据着的附中后门经过，所以我们几个都小心翼翼，生怕弄出什么响动被他们发现了把我们抓去。在一师倒是没费什么劲就把这个“打手”抓了。“打手”是个一米七五左右的壮汉，而我们几个都是未成年的中学生，押着他就像赶着一头犟驴，牵着不走打着往后退，又不能弄出太大的动静，一路上费了不少力。在经过附中后门的时候，打手觉得机会来了，就开始耍赖不走，还有意高声叫嚷，显然是想把“无产者”们引出来。我们只好连推带拉架着他走，到了新桥上他突然挣扎着往回去的方向逃跑。我情急之下顺手用手中的锄把在后边往他身上一捅，没想到他怪叫了一声，就倒在地上杀猪般地嚎，再也不肯站起来走路。寂静的夜晚他的嚎叫声格外嘹亮，穿透力特别强，传得很远，随时都可能把周围大批的“敌人”吸引过来。我们不敢纠缠太久，也不能抬上他走，只得扔下他，自己潜回驻地去了。第二天，对方的高音喇叭在街上反复叫喊：“八三一”的匪徒逞凶，将我春雷战士×××的尾椎骨打折。我听了真是大吃一惊，我并没有怎么用力啊，怎么就把他的骨头打折了？

在西师我们没能停留很久，大概一个月左右，我们又撤退到了西农。这时还

保持着队伍的，只有我们附中“布尔什维克”和十三中“九八”。比中学生懂得珍视生命的大学生们早就散了伙，其他的中学生也失去了队伍，只有一些零散的人，主要是二十三中、二十四中和四十四中的少数学生跟着附中和十三中的队伍。除了我们数百名中学生以外，西农还驻扎了一个由北碚区其他单位——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组成的武斗队伍“猛虎团”。我们所有退守到西农的中学生从那时起就合并组建成了一支队伍，对外统称中学生红卫兵九一纵队北碚支队。一直到武斗第一个高潮结束。

到西农后不久，大概头头们考虑到处于节节败退的我们今后可能要四处流动，女生、体弱的人多了不方便，就开始遣散人员。我妹妹当时也在被遣散之列。妹妹临走时来同我告别，按理说应该是一种生离死别的场面，因为在这样的武斗中，谁也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看到明天的太阳。而且，在这样“兵荒马乱”的年月，妹妹那么年幼的女孩子在外边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我也根本没有考虑。现在想起来，那次和妹妹告别，完全有可能就再也见不着面了。可是，当时我们都太狂热，似乎根本不把生死当一回事，我只是把父母走时留给我的那一份十元钱给了妹妹，甚至没问她和谁一起走，到什么地方去，怎么走……也没有送她，只是知道她第二天就不会再在西农了。那个年代的年轻人，把信仰高高地置于生命之上，像我和我妹妹这样把家和父母都置之脑后，只知道自己走南闯北地“干革命”，在那时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几乎全国的青少年，都狂热地卷了进去，有很多人真正地抛头颅洒热血，若是放在夺取政权的战争年代，其精神和行为一点也不亚于那些为信仰而献身的革命烈士。

我身边就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有一次，我们驻扎在西农的武斗团体组织了袭击对方一个“据点”的行动。袭击地点是鸡公山上的龙车寺（“车”读作“居”，一个农村生产大队所在地，我不知道为何选这个目标）。在挑选参加人员的时候，我没被选上。当时很是丧气，觉得自己又失去了一次为保卫毛主席而战的机会。可现在想起来，我真的很庆幸当时没被选中，否则这一辈子都会因良心折磨而永无宁日。

听那些参加了行动的人来说，他们到达目的地后只找到一个女青年。这个女青年是我父亲所在的西师教育系的一个学生——杨素芝（文革中更名杨捍东，誓死捍卫毛泽东之意）。也不知我们这一派的袭击人员们到底想从这个女大学生嘴里问出些什么来，女青年表现得像渣滓洞的革命志士一样，无论如何也不开口。我们一派的人用刺刀、钢钎把这个女学生捅死了。几个同去的附中学生回来说起当时的情景无限感慨，他们说：那个女的真是坚强，被捅得鲜血直流也不求饶。这使我想起当年渣滓洞烈士《黑牢诗篇》中的句子：“铁的棍子，木的杠子，撬不开紧咬着的嘴唇啊……”，如果说她是当年的刘胡兰、江姐，我们这些人难道

就成了国民党匪兵？我们是在“为毛主席而战”啊！

在以后真枪真炮的武斗中，双方像这位女大学生那样为“革命”献身的人，就更是不计其数了。特别是年轻的中学生们冲锋陷阵异常壮烈。武斗刚结束时，重庆的许多著名景点——如大田湾体育场的花坛、红港（朝天门码头）街心花园、黄山、鹅岭公园和枇杷山公园等等，都埋葬着两派在武斗中遇难的人员。我们学校“无产者”那几个阵亡的头头，埋在了学校进大门半坡上教学中心的花坛里。后来，所有的“烈士墓”全部挖除了，“烈士”的骨骸最后怎么处理了无人知道。那些虔诚地为理想和信仰而战而牺牲的“红卫兵”们——如像在龙车寺为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用钢铁意志忍受被钢钎一下一下捅，最后惨死的女大学生以及跟她一样丧失生命的千万青年，如果在天有灵，看见自己最后死无葬身之地，该作何感想啊！

发枪

当我们还在郊区北碚的西农校园内舞弄钢钎匕首时，重庆市内的武斗已经升级了。重庆是中国军事工业基地，除了原子弹以外，生产几乎所有的常规武器。此时军工厂的两派尽自己全部的可能，把拿得到的武器全都从仓库里拿了出来，武装自己和自己一派的其他组织。在武斗最高潮的时候，市区的街上开着空气压缩机厂生产的坦克，长江里游弋着望江机器厂以“海四联高射机枪”装备的登陆舰，黄山、鹅岭、枇杷山上架着大炮。各种型号的轻重枪械更是家常便饭一样随处可见。由于多数兵工厂占上风的是反到底派，所以在开始动用火器的时候，我们的武器大大地优于对方。当我们使用建设机床厂生产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时，对方还只有从当地人武部拿出来的“汉阳造”或苏式步骑枪。

在遣散大多数女生之后不久，我们也从建设厂弄来了一批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我们和十三中两校的学生加在一起有一百好几十人，人人都想得到一支枪，但第一批枪总共只有九十支，于是头头们开了一个会。不知是以什么标准决定谁发谁不发，第二天全体集合宣布持枪人名单并发枪时，我在九十人之列。我是兴高采烈又非常意外：很多出身比我好的“红五类”都没有得到枪，我怎么能享有如此殊荣？果然，发枪不久就有几个“红五类”跑去找头头闹，说是蒋国辉不是工农出身，怎么有资格第一批持枪？头头回答：现在又不是“思想兵”时期，谁还看出身？现在看的是勇不勇敢，打起来敢不敢往前冲！

用当时最好的常规武器武装起来之后，我们并没有在北碚跟八一五较量。我们离开了西农。这次离开不是因为顶不住对方的进攻，我们有精良的装备，八一五一时还不敢来碰我们。离开的主要原因是和“猛虎团”闹了矛盾。我们这些中

学生还十分单纯，有些看不惯在社会上已经混了多年的成年人的某些作风，小冲突时有发生。头儿们为了避免发生内讧，就主动带领自己的队伍撤离了西农，不过没有走远，就驻扎在离北碚二十来公里的青木关，以便西农有意外可以随时杀回来支援。

我们在青木关住了不到半个月，璧山县的反到底派人来联系，告知当地八一五很是猖狂，他们眼看就要被赶出县城了，急需我们去支援。璧山县反到底派主要组成部分是四川省汽车运输二十六队的员工，他们专门派了几辆车来接我们。我们这拨武装人员当时大概“粮草”供应也有问题，有人上门来请，正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于是我们全体人马开到了璧山县，以后就再也没有整支队伍回北碚了。

悲剧

到了璧山，我们的人马在县城的街上武装游行了几次，就把对方镇住了，他们悄无声息地撤离了璧山。

此后，当地的反到底有些得寸进尺地“请”我们协助他们搞一批武器，我们就无法无天地去当地的驻军军火库抢枪。当时军队得到上边的命令：不能对地方的群众开枪。所以莽莽撞撞的我们遇到什么阻拦就进了军火库，拿了不少手榴弹、子弹、步枪，甚至还有双管联发高射机枪。在军火库旁边的一间屋里，我看见停着两具身着崭新军装的士兵尸体。军人说，这是被抢武器的人开枪打死的。看来这个军火库已经不止一次被抢了。看得出来军人们早已是满腔怒火，只因上边有命令，才没碰我们。

几个月后，1968年的第二次武斗高潮再起时，这道命令取消了，虽然没有明确说可以向冲击军火库的人开枪，只是命令军人坚决保卫军事物资，军人也就放开了手脚。我们的队伍那时住在重庆市区，枪支弹药已经全部上缴。可是对方在驻军的默许下，还保留或“抢”到了一些武器。我们的队伍赤手空拳无法跟对方抗衡，只好去抢驻军的军火。这次行动不再像上一次在璧山那么幸运，愤怒的军人坚决开枪阻击，打死了我们这边四个人，其中有十三中“九八”的“军事领袖”王朝贵。听说，追悼会上王朝贵最好的朋友黄正柏（绰号大毛）致悼词，他只说了半句话就哽咽得说不下去了。大毛，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看起来杀气腾腾有些匪霸气的人，一个在战场上冲锋陷阵毫不畏惧的汉子，面对着年轻战友的遗体肝肠寸断泪如泉涌，会场上笼罩着愁云惨雾，在场的“九八战斗团”全体“战士”，男男女女一律失声痛哭。王朝贵一死，“九八”的战斗力的战斗力就削弱了一大截。

在璧山还发生了一件悲惨的事。我们一两百人住在县委的礼堂里。夏天天气

热，也不用什么垫的盖的，就睡在礼堂的长条靠椅上。一天早上，大概七点钟左右，我突然被一声枪响和紧接着的剧烈爆炸声惊醒。还没回过神来，又是一声爆炸。我当时的第一个念头是：糟糕，被敌方包围了！翻身拖着枪滚到地上，拉开枪栓就开始寻找射击目标。可是两声爆炸之后，除了刺鼻的硝烟味，再没听见什么枪声，倒是听见一片哭叫声。过了约一分钟，我从地上站起来，周围的人也纷纷站起来（原来大家都和我的反应一样），只见靠近一旁侧门处的长椅上，血肉模糊地倒着几个人。

一阵忙乱之后，才把事情弄清了一个大概：原来附中一个姓陈的学生，早起没有什么事，就坐在自己睡的椅子上擦手枪。他旁边还有几个起得早的人，围在一起闲聊。姓陈的这位不知怎么摆弄了自己的枪，枪突然走火，子弹射在他斜对面一个叫潘经中的学生腰上，并穿透了他的身体，打到他垮在腰间的四枚手榴弹其中一枚的弹柄上。潘本能地用手去捂伤口，开口骂“陈××，我×……”还没骂完，被打燃了导火线的手榴弹就爆炸了。这就是我在梦中听见的一声枪响和一声爆炸。潘腰间的手榴弹被炸飞了，其中一枚又被引爆。幸好是滚在门口的一枚，而不是飞到礼堂中央的那两枚，所以第二次爆炸没有伤人，不然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等我们围过去时，只见潘经中倒在地上，右手的手掌已经被炸得只剩无名指和小指，大半个手掌没有了。臀部被炸掉了一半，一片骨渣和碎肉撒在他身边一两米的范围内。潘起初还大骂了几声，很快就陷入了昏迷状态，嘴里还不时地喊几句胡话。除了潘以外，其他几个被弹片擦伤但无大碍的人，稍微包扎一下也就没事了。还有一个起初没被注意到的重伤员，也是附中的学生，叫杜昌元（西师的子女，以前和我还比较熟）。他被一块弹片从前额正中打进去，没有流血，甚至连伤口也不显眼。但他受伤后立即昏迷不醒，一声也没有吭，他就处于这种状态，直到三天后死去，再也没有清醒过。

当时我们七手八脚地把潘抬起来就往医院跑，还派人到“汽二六”去叫汽车。大家都以为杜伤得不重，所以一直等汽车来了才把他送到医院。潘立即被送进急救室抢救，我们和当地的许多人还自觉地组织起来献血。无奈当时的医疗水平有限，况且还是在一个小县城里，医生根本无法挽救潘的生命，甚至连采取什么急救措施都搞不清楚，只给他输血和打吊针，任他躺在急救室里。我们学校的几个人（我也在内）守在他身边，将他的手和脚按住，否则他会不停地扭动，把身上插的输血输液管扯掉。就这样，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他扭动越来越无力，喊叫声越来越微弱，只有个把小时，他就在我们的眼前咽了气。他死后我们走出急救室，看见自愿献血的人还排着长长的队伍。这是武斗开始以来我们学校死的第一个人，死得十分冤枉。

县医院的医生说，另一个重伤员他们也无法抢救，要我们抓紧时间赶快往永川地区医院送，那里条件好些，看看能不能抢救过来。我们马上把杜抬上“汽二六”派来的一辆卡车，派了几个人押车，我也在其中，就往永川开去。当时的公路是石子路面，车是解放牌的卡车，一路颠簸，我们轮流坐在他身边，小心地用手托住他的头。他自己则像没有感觉似的，悄无声息。到了地区医院，不知道医院采取什么抢救措施没有，两天之后，我们得到通知，杜已不治身亡。当时正是8月酷暑，潘的遗体很快开始发酵。我们匆匆找木工钉了两口薄木棺，将潘、杜两人葬在永川城外的一座小山坡上。当时他们的父母还赶来了，我们就像接待烈士家属那样对待他们，可是失去儿子的悲痛，是怎么也无法弥补的。

记得潘经中有个弟弟，当时也在我们的队伍中。潘死后，他的父母也没有坚决把他的弟弟带走，而是让他继续留在危险的武斗战场上。可见当时中国人民对自己认定的“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片赤诚之心，失去一个儿子的悲痛和再失去另一个儿子的危险，也抵挡不住“革命”的狂热。

那位闯祸的同学，还只是一个初二的学生，他倒是没伤着，可是人已经吓懵了。事发后他失去了知觉似地呆呆坐在出事的地方，嘴唇不停地蠕动，谁也听不见他在说什么。一些急性子的同学冲到他跟前骂他、打他，甚至有人说要把他拉出去毙了。他像一块木头任由别人拖拉推搡拳打脚踢，连挣扎一下的意思也没有。好在几个头头还比较冷静，把他带到一边看守起来，不让激怒的学生再接触他，否则，当天很可能还会出现新的悲剧。后来的几个月，这个同学经常独自坐在一个角落里发愣。队伍在永川解散后，我就再也不知道他的去向。

武斗队的日常生活

我们在璧山县城也没有住很久，就又转移到了永川，住在地委的大礼堂里（我们走到哪里都住礼堂，实在是人多，除了礼堂这样的地方外，确实无法安置）。永川是当时江津专区的地委和行署所在地，两派斗争比璧山这种小县城要激烈得多。我们这支武装力量的到达，给永川的“红旗”派大长了威风，对立派（他们叫“专联司”）被赶到了乡镇上。我们在永川一直住到10月左右上缴了武器，武斗的第一个高潮过去之后。

刚到永川不久，我们就收到江津军分区送来的一批“支左”旧军装。

当时我们大家都离家很久了，走的时候谁也没带换洗衣服。重庆那种高温闷热的夏天，长达数月不洗澡不换衣服，人人身上都发出刺鼻的味道，好在大家一样酸臭，谁也不能嫌弃谁。而且，我们随时都有可能奔赴战场，随时都可能是彼此相见的最后一面，“生命不过是有限的血肉之躯”这样一句过去常常在描写英

雄的书中出现的话，成了摆在我们这群血气方刚、一直认为死亡离我们十分遥远的少年眼前的血腥事实。因此身上的臭味与生命的分量相比，只能算个零。动荡的生活使我们所有人都几乎没有完好的衣服。这一批军装来得真是及时，人人都得到了一套。不过，这些衣服并不是按我们尺码发放的，所以大小不合身，新旧程度差别也比较大。但当时也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只能拿到什么就穿什么。

军装在那几个月里对每个人都是唯一的一套衣服，我们只能晚上睡觉前洗，第二天早上起来接着穿。不过，往往前一天晚上洗了衣服，到第二天早上就再也收不回自己的那一套了。军装是发的，不是买的，开始时没有人把它当成私有财产，谁起床早，就跑到晾衣服的地方，拣好的、合身的穿上。这样，本来有较好衣服的人，睡过了头，起来后就只能捡剩下的穿。当然，没有人会去追究自己的好衣服被谁拿走了，因为第二天就可以如法炮制，抢在别人前面再去收回来就是了。我自己也被这样搞过两次。起初是我自己的好衣服被收走了，我只好收回来一套很旧的；后来我起了个大早，又收回一套稍好一点的。但我最开始那套新的再也没能收回来，因为几次之后，大家都学乖了，洗的衣服不再晾晒到公共场所，而是搭在自己睡觉的长椅子背上，打上了私有财产的标记。

地区的食堂里饭倒是能吃饱，但基本上没有肉吃，顿顿的菜蔬都是藕。藕本来是营养价值高、口感好的一道菜，可再好的东西也经不住这样月月吃、天天吃，顿顿吃，吃得人看见藕就胃痉挛。现在，回头反观当时的情景，国家到处在武斗，各种生产基本都停止了，而吃饭的人有八亿之众，其中相当一部分吃的还是“共产饭”，如此，就是一座金山也会被吃空了啊！可那时的我们，正处在革命的狂热中，根本没有去想这些简单的道理，但生活条件越来越差确实是有感觉的。

有一天我走进食堂，看见饭桌上放了一小盆深褐色粘稠的羹状物，看上去像是红糖，闻一闻，也像。我一下子兴奋起来，以为自己发现了新大陆，就迫不及待地用饭勺舀了满满一勺送进嘴里。一股苦咸的味道刺向舌根，喉咙好像被什么东西捅了一下，胃里开始翻搅，一股东西“哇”地一下喷射出来。过了好一阵，胃里才平静下来。原来那盆里装的不是什么红糖，而是用酱油泡起来的盐，要不，怎么会放在那么显眼的地方等着我来发现！

还有一次头头们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点钱。客观地说，在那个相当于战争年代的岁月里，人确实纯洁，头儿们也没什么特权思想，他们往往因打仗不怕死、冲锋陷阵在前而赢得了部下们的拥护和信任。这一点我们的对立派也是一样的。附中“无产者”的几个主要头头都能舍生忘死，从使用冷兵器打架到使用热兵器打仗，任何时候都是冲在最前面。武斗升级到使用枪炮不久，在攻打 845 厂的枪战中一、二、三号头头全被打死了。生活方面，更是“官兵”一致同甘苦、共患难，搞到了钱，也没有人想到要以权谋私据为己有，而是采用了原始共产主义平

均分配的原则，我们每人都分到了约一元钱。

拿到钱后，几乎所有的人都做了同样的两件事：第一是到饭馆里去大吃一顿肉；第二是到相馆里去照穿军装、挎冲锋枪的照片。我那次拍的两张照片，现在都能算着“文物”了。

没有见到“敌人”的战斗

到永川后没多久，我们真正开始了荷枪实弹的战斗。一天晚上，“上边”下达命令，让我们去攻打距离县城几十里路的一个由“专联司”占据的乡镇。我们于晚上10点钟左右从驻地乘车出发，先到了一个好像是大机关的地方，在那里吃了一顿饭，又发给我们许多面包和饮料，然后我们就开始了跟战争年代一样的夜行军。天快亮时，队伍停下来，让我们就地隐蔽待命。周围都是庄稼地，开始我们还纷纷寻找隐蔽的地方趴下来。可是趴了个把钟头，天已经大亮了，环顾四周根本看不到任何有“敌人”的迹象，大家就放心地坐了起来，大大咧咧地把带来的面包和饮料拿出来吃喝。一直等到将近十点钟，才有命令叫继续前进。

前进了没多久，远远看见了一个集镇，看来就是我们这次进攻的目标了。队伍中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人人都作好了战斗准备。这时从那个集镇方向传来了枪声，我们的队伍一下子分散开来，毫无作战经验的一群中学生，只能凭自己的感觉和从战争电影中学到的“经验”，猫着腰借着隐蔽物慢慢向枪响的方向靠近。前方的枪声和爆炸声有一阵十分激烈，等我们到达时已经平静了下来。后来的情况我有些记不清楚了，只记得进去的时候没有遭遇什么抵抗，我们兵不血刃地开进了集镇，连放枪的机会都没有捞到。其实，真要遇到了抵抗，我们也不可能有组织地攻打，只能是各自拿着枪瞎打一气罢了。不过，我们的武器在当时可算十分精良，清一色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还有一挺五六式轻机枪，都是重庆军工厂生产的当时中国野战部队的常规武器。永川当地的武斗人员，手里只有“老套筒”，就连当地军分区的独立团，使用的也不过是苏式步骑枪。仅就武器装备而言，我方算得上是正规的野战部队，对方则只能算作游击队，双方真的交上火，我们在火力上肯定占上风。

我们在镇外的小山坡上，看到了战斗留下的痕迹：在一个直径约两米的坑里，倒着六具尸体，其中的一个头被弹片整整齐齐地从耳朵以上削掉了，脑髓就像快刀切开的西瓜瓜瓤。坑里的积血有几厘米厚，还没有完全凝固。看来是被手榴弹炸中了。不过我始终没有搞清楚，这些被打死的人是哪一方的？是谁把谁打败了？按理，取胜的一方应该留在集镇里，但我们进去的时候，集镇上见不到任何武装人员。

当晚在集镇的一个小饭馆吃饭。那时吃饭不像今天，一落座就是七盘八碗，谁也不甘心被人说成小气鬼。那年月即便是在饭馆吃饭，一般也就一个菜送一大碗饭，吃饱就行。那天的菜恰好是烧猪血旺。我原本是很喜欢吃猪血旺的，但那天我吃不下，满脑子都是那些被炸死的人还没有凝固的鲜血。

在那以后不久，我们就经历了一次大规模的战斗——那是在全川甚至全国都出了名的“武装支泸”。这次事件我将用另一篇文章单独记述。

东躲西藏的日子

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川北地区，是五十四军的驻防地。这支军队一直偏向于八一五派，所以对收缴我们这一派的枪支弹药表现得十分强硬。不过我们当时也没有想过要抗拒不交，只是很担心我们交了，对方不交，以后再打起来我们就吃大亏了(以后事态的发展也果然如此)，所以拖着不认真办，到后来实在顶不住了才交。在交枪的前一天，几乎所有的人都跑到城外过“枪瘾”，把自己剩下的子弹统统打光。那一天整个永川城里城外一片“噼噼啪啪”的枪声，机枪、冲锋枪、步枪、手枪足足打了好几个小时，好像是过年时放鞭炮，但给人的感觉不是热闹，而是惊心动魄。

交了枪以后，人心似乎也就涣散了。突然没有仗打了，原先绷得紧紧的神经一下子松弛下来，一时大家都有些无所适从，不知道该干什么。我趁这个机会跑回重庆和父母见了一面。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当时在重庆是怎样找到父母的。我先到了重庆市经委机关大楼，碰巧遇到了西师中文系的刘扬烈老师，我的父母在茄子溪就住他老丈人家。刘老师带我找到了父亲，但只有他一个人住在经委大楼里，父亲带我到了上清寺的一家小旅馆内，才见到了母亲和弟弟。这时距我跟父母在西师分别已经过了三个月，生死难卜的三个月。生离死别的亲人见了面，没有眼泪没有悲伤更没有表达情感的肢体语言，一切都深藏于心，表面上看起来，大家能够平安见面就已足够了。特别是我，一个从血与火的战场上拼打出来的“战士”，似乎更有“英雄气概”，全不屑于儿女情长。

那次和父母亲及弟弟见面说了些什么，一点印象也没有了，只记得好像大家一起到经委的食堂吃了晚饭。晚饭后我到大田湾体育场的接待站去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没和父母告别我就回永川去了。不过当时父母也没办法留我跟他们一起住，离开西师三个多月没有领到工资。搞武斗那段时间，我们这些武装人员手里拿着枪，到哪里都被人菩萨似地供着。像父母这样离家逃难的普通老百姓就苦了，如果当时没有同事和熟人的帮助，他们可能真会走投无路。这样颠沛流离的生活，断断续续地从1967年夏天持续到1968年秋天。

我回到永川又住了个把月，天气渐渐凉了，我们仍旧每人只有一身单军衣，头头们也无计可施。此时，已有不少人离开了队伍。后来头头们考虑到，像我们这样手无寸铁集中在一起，如果对方打过来，我们有的只是血肉之躯，伤亡惨烈可以想象。与其无谓地牺牲，不如先解散，等有什么新的动向时再组织起来。就这样，我们这支武斗的队伍在解除了武装之后人员也解散了。有许多人从此没有再回去，我也是其中之一，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武斗生涯就此画上了句号。

第一次武斗高潮刚刚平息，我突然回到家里，父母害怕得不得了，根本不敢让我抛头露面，一有风吹草动就把我藏在里间或邻居家，一家人整日如履薄冰。原来，以前我们居住的文化村五舍的邻居告诉他们，说附中“无产者”的人曾经荷枪实弹地到那里去抓我这个“布尔什维克的武斗干将”。当时北碚区乃至整个重庆市都在八一五派的控制下，像我这样曾经拿着枪跟他们作对的人，若是被他们发现，立刻就会被抓走，保不保得住性命，谁也不知道。有一天，听见敲门声，我还没来得及藏进里间，来人已经推门进来了。情急之中我只好往门背后一站。推门进来的是两个女的：中文系刘老师的侄女和她的另一个亲戚，她们一眼就看见我正在往门背后躲藏，弄得我这个也算枪林弹雨中闯过来的七尺男儿感觉丢尽了面子。

这样在家里藏来藏去也不是长久之计，父亲就同他在424部队（军事院校）的几个军人朋友联系，把我送到了那里躲避。住在军事院校里倒是安全，没有人可能到这里来找我。但部队毕竟是部队，一个老百姓天天和军人们混在一起，尤其是吃饭的时候在一个食堂进进出出，太显眼太惹人注目。部队也不是铁板一块，里面的军人也并非个个都是父亲的朋友，时间一久惹人注目变成了引人侧目，有些目光就带上了芒刺的味道。文革期间部队纪律已经不那么严密，我得以在里边住了约半个月，之后越来越觉得自己太过另类，确实不好意思继续待下去了。

从424部队回家后，又在家里住了十多天，父母日夜坐卧不安，担心着突然有一天“无产者”会来抓我。左思右想最后决定让我去遂宁的五叔那里，大家一致认为小地方不会有什么大的武斗之类的危险。五叔自然也是希望我能去他那里。就这样，在1967年初冬的时候，我又一次离开了家。

我在五叔那里住了不到一个月，二十多天后他们学校放寒假了。五婶的工作单位在达县，所以寒假五叔要去达县。我又到河南三门峡二姑母处农村居住了半年。到了1968年春夏间重庆武斗高潮再起的时候，先前的那支队伍又拉了起来，还打了几次恶仗，死了若干人。这时的我在河南三门峡的农村中，同我那些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们已经远隔千山万水了。

下乡之前

直到重庆的武斗再次平息下来，我经成都辗转回到重庆不久，开始了“复课闹革命”。学校里驻进了由军人组成的“军宣队”和由工人组成的“工宣队”。说是“复课”，其实根本没有上任何课，主要目的是把我们这些在武斗中搞野了的中学生收拢来，等待下农村的总动员。“复课闹革命”并没有搞多久，过了两个多月，从初一到高三，六个年级的所有中学生将一律下放农村的消息就传开了。学生一下子成了一盘散沙，谁也没有心思坐在教室里复什么课，更不想再闹什么革命，人在学校，到教室去的时候基本没有。从来没有想到过有一天会离开城市，离开从小就习惯了的生活环境，学生们三三两两地跑到街上瞎逛，心中充满了将要永远告别城市生活的不舍和悲哀。街市上原先熟悉得跟空气和水一样被忽略的东西，一下子都变成了稀世珍宝，想要看个够，总也看不够。好些同学就干脆回家不来了。军宣队工宣队也想组织管理起来，可觉得前途云遮雾罩的中学生们，已经失去了往日的热情，再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令他们云集一处舍生忘死奋勇向前了，只好放任自流。结果还不到放寒假，“复课闹革命”在学生的自由散漫中匆匆结束了。

下农村之前，我还干了一件事，虽然不是什么的大事，却让我伤了不少脑筋。在永川交枪的时候，我曾悄悄地留下了一包子弹，大概有不到一百颗，包括各种机枪、步枪、手枪的普通子弹、穿甲弹、曳光弹、开花弹等。我这个人有收藏的爱好，除了邮票这个真正有价值的收藏外，我还收藏过糖纸、香烟盒、画片（这是一种一寸长，半寸宽的硬纸片，上边画的多是古代的人物或戏剧脸谱，有的就是缩小的连环画。小学时很多男孩都喜欢收集这种画片）。这些各种不同的子弹，我也想作为收藏品保留下来。谁想我们下农村前不久，政府又发出一道命令，要公安局负责将散失在民间的武器收缴上来，对隐藏武器不上交者，作刑事犯罪处理。这样一来，我的那包子弹就藏不住了：万一被公安局来人收到，我自己倒霉不说，还要连累全家，何况母亲本来就已被打入另册，我的事更会让她罪加一等。没办法，我只好把这包东西拿出家门，却又舍不得就这么丢掉，想找个地方藏起来，等风声过后再拿回来。那是晚上十点多钟左右的时候，我拿着那包子弹，在我们家附近荡了一个多小时，也找不到合适的地方，总觉得藏在哪里都会被人发现。最后我把它藏在了附近的公共厕所的房梁上。以后的几天，我差不多天天要去那里看看是不是被人发现取走了，可是直到下农村，我也没有机会把它从藏匿的地方取回来。

到农村后，这件事被慢慢淡忘了，因为有更多需要操心的事情和更多需要应付的人生问题出现了。

【生逢乱世】

“八二八”惊魂

秋 雨

每年到了8月28日，我都不由得会想起文化大革命中在重庆的那场枪战。

当兵16年，没有和敌人接触过，却遭遇了一场内战。那是一场真枪实弹、你死我活的战斗，我和我的战友们在生死线上支撑了13个小时，真可谓是死里逃生啊！

1966年8月，我从驻福建莆田的82师选送到重庆通信兵技术学校学习，当时可高兴死了。重庆通校地处重庆北碚一个叫歇马场的小地方，代号“总字424部队”。校园好大，占地至少200亩，院内楼房错落，绿树成荫，环境相当优美。大门口有重庆警备司令部一个排负责警卫，戒备森严。因为是一个无线电通信学校，四层的教学大楼内拥有从最原始到最新式的各种电台，所以这里是重点保护单位。

1966年8月29日，学校举行开学典礼。此时，校园外却云集了地方上的各色战斗队，在一面面红色队旗的引导下，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冲进了校园，“造反有理”的歌声搅乱了隆重的典礼大会。

还没有上一堂课，我们就被卷进了那场后来被称之为“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我，当然也不例外，从此就投入了“保卫毛主席”的战斗。

重庆是个非常特别的山城，在推行“三线建设”战略的那个时代，这里安排了7所军事院校，光通信兵院校就有3所（除了我校外，还有在歌乐山林园的通信兵工程学院，代号总字412部队；在石桥铺的通信兵雷达技术学校，代号总字421部队）；重庆主城区范围内还有8个兵工厂，除飞机外什么武器都能造，这也给重庆武斗升级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我们学校因地处偏僻，显得有些“与世隔绝”，本来没有介入地方上的文革运动，学校的群众组织头头对地方造反派的分裂一直持中立和促进大联合的态度。直到1967年5月7日中央发布《关于四川问题的决定》即“红十条”之后，前一段大张旗鼓的“二月镇反”遭到否定，一度被打成反革命的一些群众组织（如军事院校中的后字242部队红总和地方上的西南师范学院“八三一”、重庆交通学院“九一五”，当时被重庆市八一五派夺权后得到驻军支持建立的临时权力机构革联会称为“三大右派组织”）陆续平反，重庆两派对立更加严重。形势逼迫我们不得不对地方运动表态。为慎重起见，我校派出了十二个调查组，分赴重庆一些工厂、学校进行社会调查，目的是全面了解地方两派观点，以决定下一步的行动。

5月9日，谢教员和我等三人进驻重庆棉纺织二厂开展调查。

5月14日，分赴各地的调查组返校。

5月17日，我校传达了中央《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即“红五条”，五条意见中回避了当时重庆两派争论的焦点革联会，而是决定另外组建一个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5月20日，我参与一个三人观察小组进入沙坪坝区，驻重庆大学调查。当时重大校内一片动荡，此前基本上清一色的八一五派出现分化，一些人开始表示反对革联会、批判八一五总团的态度，对立情绪加剧。

5月23日，我们转入重庆棉纺织二厂继续调查。

6月8日，西南师范学院发生两派大规模武斗“六五——六八”血案的消息传来。

412红色造反团驻二厂的人员持坚定的保革联会观点，他们不满我们的中立立场，借故对我们进行围攻。

6月10日，我校“红联”通过各调查组的汇报，研究决定放弃促成大联合的初衷，公开表态支持西师“八三一”等组织，明确站到了“砸派”（即反到底派）一边。

这时，重庆的武斗已经逐步升级到使用棍棒、钢钎，不久又升级到使用步枪、手榴弹，很快又用上了机枪、火炮、坦克、舰艇，除了没有空战外，其他武器全部都动用了，真是惊心动魄。

我旁观了两场使用冷兵器的武斗，虽然当时还未动用现代武器，看起来也令人毛骨悚然。

第一次是在重庆医学院。只见两个大约160到200人的方队，清一色的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每人手里一根2米多长的钢钎（自来水管焊三棱刺刀制成），队伍相当整齐，应该不逊色于阅兵方队。他们在宽阔的马路上相隔约10米对峙，不时有一队发出呐喊，以齐步走形式向前推进，另一队则整齐地后退；撤退方在退出数十米后，也发一声呐喊，转退为进，迫使对方后退，如此循环往复。在双方方队的后面，则有一些人向对方投掷石块、砖头，由于队伍步伐整齐，纪律严明，人们并不躲避，所以时有中弹者头破血流。我注视了半个钟头，双方就这么耗着，完全是秦汉军队的战法，其大无畏作风倒也令人称道。

第二次是在望江机器厂，一个制造高射炮的兵工厂。这个厂是“反到底”占优势，但“八一五”还保存着最后一个据点，是一栋三层楼宿舍，一楼的窗户已全部用砖头封堵，唯一的大门也仅留下一个小门洞，铁门后昼夜有人把守。6月24日清晨，“反到底”决心拿下“八一五”最后的据点，组织了一次强攻。因为还是“冷兵器时代”，正门无法进攻，他们打算采取云梯攻城战术，从盖着瓦的

老式屋顶向下压。

一个由3架木梯绑扎而成的云梯搭上了屋顶，云梯上端系着粗绳索，两人站在墙根，冒着对方的石弹紧紧拉着绳索防止梯子倾倒，而对方则从二、三楼窗户用竹竿试图推倒云梯，同时向爬梯人员实施攻击。冒着极大的危险，“反到底”的突击战士开始冲锋，只见一个十六七岁的孩子快如猿猴，三步两步就爬到了屋顶；第二个突击队员紧随其后奋力攀登，就在接近三楼时，意外发生了，云梯突然断裂，第二名突击队员随垮塌的云梯摔下地，身受重伤。要命的是屋顶上只有一个人，这时对方趁机反攻，几个人爬上屋顶围剿这名突击队员。围观的人群一片惊呼！寡不敌众，这孩子怕是在劫难逃了。作为局外人，我也着实为这个孩子捏了一把汗。“狭路相逢勇者胜”，不愧为经典名言。只见这孩子瞪着血红的双眼，双手大把大把地搂抱着从屋顶揭起的瓦片，发疯似地向对方砸去，身子毫不退缩，直扑向前，吓得对方节节败退。这时，地面有人搬来高压水枪，有力地支援了孤军奋战的孩子；云梯也重新接好了，后续部队陆续赶到，对方见大势已去，只得缴械投降。

后来，武斗逐渐升级，凭借众多兵工厂的优势，重庆陷入了地地道道的内战炮火中。重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过多少次枪战炮战，我说不清；重庆在历次大规模的武斗中死了多少人，我更说不清。我只记得那个黑云压顶的“八二八”。

重庆北碚，此时已经是“八一五”的天下，“反到底”的最后一个据点西南师范学院被拿掉以后，少数成员躲进了我们学校，在北碚这块“红色”土地上，424部队成了“反到底”的唯一落脚点。424是通信兵技术学校的代号，由红色造反联合总队（简称“红联”）执掌大权，另一派势单力薄，基本没有形成像样的组织；重庆另一有名的军事院校后勤工程学院，代号后字242部队，该校占优势的组织叫红色造反者总团（简称242红总），与424红联都是支持“反到底”的铁杆派。二者代号数字叠加，被“八一五”称之为山城毒药“666”，其影响之大可见一斑。铲除这两个“毒瘤”已经是刻不容缓的大事了。

1967年8月28日这一天，火炉重庆照旧闷热难当，在连电风扇都没有的宿舍里，我翻来覆去难以入眠，后半夜刚刚入梦，突然被一阵清脆的枪声惊醒。这是凌晨4点，我们这个学员班12人，几乎同时坐起来，大家面面相觑。紧接着，又响起急促的枪声，情况不妙！我们立即弹起身，仅用了1分钟就穿好衣服，拿起武器跑出屋外。只听有人说：北碚的八一五派打进来了，赶快到教学大楼集合。前面说过，教学大楼是重点保护对象，此地相对安全，后来对方向校园轰了几炮，还真不敢炸这座楼。

进入大楼，里面已经是人声嘈杂，大家都摸不清情况，只能静静地听着枪炮声，惶惶地等待上级的命令。其实，那个时候，已经是无政府状态，校领导靠了

边，没有谁说话算数，这个“上级”，也就是校内掌权的所谓革命造反组织“红联”的头头们。

不久，传来了确实消息，重庆地方的“八一五”派组织了数万人（一说三千人）攻打学校。同时通知大家，对方已经切断了水电，我们不但没有饭吃，连一口水也喝不上。下一步怎么办？谁也不知道。

枪炮声继续响个不停，大家隐蔽在窗户旁，注视着前面的操场，防止对方的进攻。教学楼居高临下，视野开阔；大操场一览无余，无险可据，对方要进攻还真不容易。可是我们却水米未进，酷暑难熬。

突然，操场对面的小山上射出一串子弹，硬是穿透了教学楼的三道砖墙，落在了后面一个教室的地上，有人看了说，这是高射机枪的子弹，杀伤力极强。大家惊出一身冷汗。看来靠一堵砖墙隐蔽自己是不行了，我们撤到了后面，只留岗哨监视对方，不过，对方始终也不敢冒险闯过这片光秃秃的操场，双方就这么僵持着。

没有后勤供应的我们当然不可能坚持多久，对方也不急于进攻，这种特殊的战斗也不是为了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谁也不想、也不必冒这个险。耗到下午5时，指挥部终于下达了撤离命令，先遣队推倒了后围墙，利用后山的有利地形开始撤退。

撤退路上有一个裸露的小山坡，通过这个大约30米的山坡就进入安全地带。对方还真有点军事常识，竟然对着这里设下了一个机枪封锁点。虽然他们也害怕被攻击，把他们的机枪布置在300米开外的山头上，但居高临下，又在射程内，搞得我们险象环生，我就差点在这里被报销。

我们是一个一个通过这个封锁区的，待枪声短暂停顿，即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跃过这个死亡地带。正当我冲到接近安全地带时，突然脚下一滑，身子立即倒地并顺坡滚了下去，刚好滚进一条小水沟。而正在我倒地的同时，一梭子弹就在坡地上啾啾地冒出尘烟，后边瞭望的战友一看，惊呼：完了！他们以为我是被击中倒地的。而我，也幸亏摔了这一跤，躲过了一劫，命不该绝呀！

晚7时，我们在一个小镇吃了点饭，又连夜赶到壁山宿营，第二天赶到永川，我们不敢去车站乘车，重庆的一趟旅客列车在一个比较隐蔽的地带临时停车，我们这些疲惫不堪、浑身污渍的解放军半路上车，还真让旅客们吃惊不小。

这天晚上，我们狼狈不堪地逃到了成都，除了一身军装、一支步枪，我们已经一无所有。成都的部队捐赠了衣物，并安排了吃住，算是暂时安定了。

这次事件，我们学校被打死8人，其中一位教务处长，另有一位就是死在封锁线上。地方上死了多少，我不知道，这几天在网上查了一下，说地方上死了33人，其中包括滞留在我们学校的“反到底”派学生。后来，听当地的老百姓

讲，学校被偷抢了三天，除了不动产，能拿走的东西都拿光了。我 1968 年秋才回校，宿舍里一无所有，只剩下几块光溜溜的床板。

武斗？战争？！刻骨铭心啊！

20100828 初稿

20140606 修改

【生逢乱世】

血腥岁月的一页

——潘家坪战斗亲历记

从 闻

在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重庆从 1967 年夏到 1968 年秋一年多的时间里，各区县大小战事不计其数，双方死伤上千人。而潘家坪战斗是这数不清的战事中死亡人数最多、动用武器最多，双方争夺阵地战最为惨烈的一次。

1967 年 8 月，骄阳似火，重庆两派的对立情绪跟气温一样升高，到处战事频发。大约是在 20 日的下午，北碚区捍红总部北机分部（全称是“北碚区捍卫红色政权联合总部北碚机械厂分部”）接到紧急通知：五点钟提前开晚饭，五点半各队带上武器集合，准备去参加战斗。当时北机分部有两个队一个班，共三百多人。他们是天府“三一八”工人纠察队、代家沟红农战斗队和一个直属捍红总部指挥的侦察班，这个班是从 44 中、48 中、朝阳中学和代家沟红农战斗队抽调的 9 个精干人员组成的，由当时的成字 302 部队（解放军机要学校）“五四兵团”的两个教官进行集训。我当年 16 岁，也被选调到这个班里。

接到命令以后，大家各自准备自己的武器装备。五点刚过，从重庆第五棉纺织染厂食堂运来两车丰盛的饭菜，大家赶紧抓紧时间吃饭。五点半各队均带上武器，集合在院坝里。不一会儿，从北碚区门诊部方向开来五辆解放牌卡车停在公路边，我们北机分部大约 150 人左右上了车。大家拿着各式各样的枪支，有的拿着钢钎、铁棒，有的背着自制手榴弹，还有的干脆拿着青杠木棒和狼牙棒（80 公分长、上大下小的木棒，大头四周钉有无数钉子，短兵相接时非常有用），头戴藤帽或头盔，雄赳赳、气昂昂地站在车厢里。当时大家并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去做什么。

不一会儿，卡车把我们运到了朝阳中学的操场。那里已经有好多车停在操场上等待，陆陆续续又有几辆车开进来。我们在车上静候着，没有一个人说话，都

在等待着出发的命令。那时我们中学生特别喜欢玩枪打仗，认为是在捍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甘愿抛头颅洒热血为真理而斗争，心里其实感到很紧张，但没有一个人表现出来。在车上等了大约一个多小时，实在有些站不住了，我们就索性坐在车箱里，心里嘀咕着：这么多车和人，是要到哪里去打仗呢？但谁也不好问，只是默默地等候着。

约八点过，天渐渐黑下来，见两个背着驳壳枪，像是指挥员模样的人快步跑到我车驾驶室前，与驾驶员说了些什么，就匆匆离去了。这时，从副驾驶位置钻出一个人来对我们车上的人说：“大家准备好，我们走第一个车，所有的武器，子弹全部上膛！关上保险！不准说话！保持警惕！遇事听从我的指挥！”

又过了一会儿，天已基本黑下，我们开始出发。隐隐约约可见车动人行。车在开出学校大门时，我回头用眼扫了一下，大约有十二、三辆车，大家都不吭声，死盯着前方。卡车沿着人民路弯弯曲曲地走着。人民路本是一条笔直的公路，武斗时期因设置了很多路障，晚上行进怕暴露目标，不准开车灯。车一会儿左，一会儿右地向前开着，过了龙凤桥，沿着鸡公山脚向重庆方向缓进。当车行至十三中（今兼善中学）门口时，突然停了下来，我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端着枪的手指都放在了扳机上。约莫过了一刻钟，估计是十三中“7803”战斗团的人员上车加入了此次战斗行列。车继续往前走，一会儿开一会儿停，搞得我们格外紧张。

我们第一辆车的火力配置算是最强的，车顶有一挺56式轻机枪，车两边各有两支冲锋枪和三支半自动步枪，其余的是天府“三一八”工人纠察队的二十几名背着“三八大盖”和苏式步枪的年青人。据说苏式步枪杀伤力非常强，在五六百米处能穿透两个人的胸膛。

车在黑夜中行进着，初秋的夜晚清醒着我们的头脑，一点没有倦意。大约十点过，车开进了一所用红砖围起的像院校一样的大操场里，后来知道是重庆市党校。大家下了车，就地集合待命。此时到处是武装人员川流不息，有背长枪短炮的，有拿钢钎大刀的，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的戴着钢盔、藤帽，有的戴着军帽或光着头。不时有零星的枪声不知是从哪里响起。

过了约莫半小时，从后面隐约听见轰隆隆的机器轰鸣声，转头看见黑暗中两个庞然大物正慢吞吞地向我们正面爬来，好家伙，两辆坦克昂着炮筒从我们面前通过，后面紧跟着两挺“127”双联高射机枪和一挺“145”四联高射机枪，后面跟了好大一群人，有的背着带十字天线的步话机、拿着话筒，还有背药箱的，扛担架的……

16岁的我，平生第一次看见真坦克，既兴奋又激动。重庆的武斗可算是全国之最，除了飞机以外，大炮机枪高射炮、坦克军舰装甲车、地雷手雷燃烧弹、手枪步枪冲锋枪……几乎所有的武器全用上了。

时令已过立秋，夜风带着一丝丝凉意拂过我们身边，大家席地而坐，可能是没马上被命令上阵，紧张的心情稍有缓解，但就感到饥肠辘辘了。有人送来鸡蛋和馒头，大家狼吞虎咽地吃着，望着三五成群的人跑着奔着，不知我们到底要干什么？

过了一会，一个戴眼镜学生模样的人（后知道是“捍红总部”的老金）将我们带到一堵围墙边蹲下，告诉我们：对面是潘家坪“反到底”占领的地方，等会儿战斗打响以后你们突击时用“三三制”方式前进攻打对方。所谓“三三制”战术，就是三人一组成三角形，左、右、前各三人，再组成一个大三角形，相间八到十米的距离，同时向前推进。这种战术在作战中非常实用，进可相互支援，退可相互掩护，一方受敌两方支援，是我们常用的进攻战术，这在集训时就学会了的。大家心神领会地靠在墙边坐着，心又回到高度紧张状态，等待出发的命令。

当时老金选我们参与此次战斗是有原因的。因为北碚去参战的队伍中我们侦察班火力配备是较强的，全班虽然只有九个人，但有三支冲锋枪六支半自动步枪，三组中的分配是一支冲锋枪两支半自动步枪。分大组行动时变成‘五四组’，五人一组的一支冲锋枪四支步枪，四人一组的两冲两步（这是我们在集训时就分好了的，后来在每次的战斗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冲锋枪每人三个弹匣（每个弹匣30发子弹），半自动步枪每人五板（每板10发子弹），外加每人四颗军用手榴弹。九人中，六个初中生，三个年青力壮的农民，全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钢杆，加上训练有素，历次战斗都冲锋在前，从未闪失过。

眼前的车不停地在开，人不断地在跑。约十二点左右，三颗红色信号弹不知从哪里腾空而起，轰的一声巨响，刹那间天摇地动，枪声、高射炮声、坦克炮声、爆炸声顿时响成一片，子弹炮弹带着刺耳的嘘叫声和流星雨般的曳光向对面阵地倾泻而去，对面阵地不时闪着爆炸的火光。地面上无数身影在火光的照耀下向前蠕动着，大战序幕拉开了。

激烈的战斗进行了近一个小时，这时不断有伤员被抬下来，车水马龙般的担架队、救护队在我们面前奔着叫着，汗流浹背的战斗员有的扛着弹药箱有的拿着各式武器神情严峻地奔向各自目标。和我们一起来的工人、农民队伍都陆续上去了，而我们却一直靠在墙边，看着一批批伤员被抬下来，激烈的枪炮声一阵高过一阵，而我们却一直按兵不动……

我们前边十来米左右有一挺“127”双联高射机枪，我听说过是打飞机用的，只见旁边一个副手不断地在送子弹，射手两只耳朵用棉花塞着，张着大嘴在那里又喊又叫，他用双手握着操纵杆，眼睛瞄了一下枪管上的准星，脚一踩，子弹带着火光就像连珠炮一样飞向了对面，那震耳欲聋的声音覆盖了整个阵地……后才知道由于“127”机枪是两支枪管同时射击，声音特别大，张着嘴喊叫可以减轻

对耳膜的震动。

黑暗中，一个人猫着腰飞奔过来，是“捍红总部”的老金，他满头大汗，军帽下的眼镜上不时掠过反光，走近便说：狗日的对方火力太强，我们一二梯队跟本攻不上去，还伤亡了好多人，现在只有学生队伍上了……说着他从书包里拿出一堆白布条，每人发了一根，对我们说：“把白布条栓在左臂上作记号，因天太黑人又多怕误伤自己人，目标是前方对面那个小高地，注意隐蔽分成‘三三制’前进，我去叫高射炮掩护你们，随后就到。”

我们九人按事先分好的三个组，子弹上膛，绕过围墙便是一片广柑林，高低不平到处是荆棘。我们按平常作战的方式匍匐前进，子弹在头上嗖嗖地飞过，我参加战斗多次，听声音知道子弹飞得较高没有危险，便猫着腰边打边冲，刚跑了十来米，被一个软绵绵的东西绊了一下，低头一看，不知是哪个队的战友已长眠在那里……

抬头望去，一个像是山包又不是山包，似工事又不像工事的长约十七八米、估计有二三十度的缓坡，离我们约一百米左右，几条火舌不时地向外吐着火焰，估计那是几个地堡或者战壕，左右各有像房屋一样的工事，机枪冲锋枪交织地在来回扫射着。从子弹的火光上看，封锁的范围大概在开阔地五十米处。出广柑林，前方就是那个开阔地。看看左右，战友全不知在何处，“三三制”早已荡然无存，我既不能喊又不能叫，只好凭着经验利用地形地物小心翼翼地慢慢往上摸。

快出广柑林了，突然后面窜上来几个人，原来是老金带着的七八个人跟过来了，有两个是我们班的，其余几个不认识。大家趴在地上一起商量进攻的对策。老金说：“前边这片开阔地非常危险，它没有障碍掩体，距离又长，我们很多人都牺牲在那里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我们分头行动，避开封锁区瞅着空子向前面那个地堡靠拢……”

大家正准备分头行动，突然从我们身后方飞来一颗“127”子弹，正好打在我左边不到一米的一个不认识的战友口中，只见他连叫都没叫一声，头基本上都没有了，软绵绵地倒在了地上。原来掩护我们的高机射手不知我们已接近对方前沿，还在一个劲地向对方猛射，导致了误伤。老金急了，他叫骂起来，喊另一个人将死者背下去，还叫他去告诉高机手不要再打了，回过头他将死者的一支“79”式步枪递给我叫我拿上，说是战斗结束后要交回本人“战斗队”里去……

我本有一支半自动步枪，现又带上一支步枪，个子不高的我行动极不方便，特别是在那枪林弹雨之中前进，不仅困难而且非常危险。约莫爬了20米，已接近前沿。对方火力的确太强，带着笨重的“79”式步枪实在太不方便，于是找了个低洼处，将步枪的枪机卸下，弹匣里一颗子弹都没有，将枪扔到低洼处，揣着枪机又匍匐前进了。我左滚右爬地前进了约20多米，对方前沿已基本可见，滚

到一处草丛中细看，正前方共有4个火力点，间隔约3至5米，右边二楼有两个间隔约七八米的交叉火力点。从火力点射击后更换弹匣的时间长短判断，左右两个火力点最强，大概是“56”式轻机枪，中间两个火力点则可能是“56”式冲锋枪，但他们有个共同特点就是没有目标，火控范围始终在开阔地约30至50米以内。现在回忆分析，是因天黑，我方很多人又没有经验，所以在此处人员伤亡不少。我当时看准离我最近的一个火力点，摸出手榴弹朝对方掷过去，随着轰的一声爆炸，发现在爆炸的一瞬间，机枪声居然没有停过。我投弹的准确率是非常高的，对方火力点离我距离也不过三十米左右，不出意外弹着点应该是在火力点一米左右，这正好是杀伤力最佳范围。为了再探虚实，第二颗手榴弹带着一股白烟，在火焰交织的夜空飞向了对方。又是一声炸响，对方枪声仍没间断地在狂吼，可以断定对方是在工事里盲目乱射，根本没有目标。为了以防万一，我压满十发子弹，将枪机放在连发上，瞄准目标就是一阵打，接着抱着枪迅速向右边滚出五六米，对方还是没有任何反应，我趁势瞅着空子连滚带爬地冲进了对方前沿，这时他们的火力网已成死角。躺在对方炮火连天的前沿上，这时我喘着粗气，终于冲上来了，决战雌雄的较量近在咫尺，眼望星空，双方各自用枪弹、炮弹、曳光弹编织而成的巨大火网，把整个战场映得五颜六色，不绝于耳的枪炮声环绕在四周。嗓子被火灼似的，口干舌燥，这时才想起水壶，从肩上解下来，水壶早已空空。原来满满的一壶水，由于冲锋时水壶的木塞子不知什么时候没了踪影，水也不知什么时候漏完了。

正在思索着，隐约听见有响声，我猛翻身把枪拿在手中，只见左边有几个人影在蠕动，心想：狗日的你们还敢出前沿……手指本能地伸向了板机。细细一看，对方左臂都系有白布条，原来是自己人，这时才意识到夜间标识的重要性。爬过去，只见老金一伙人也已冲上来，大约六七个人。当时他的意思是在清晨五点半之前一定要攻上去，否则天亮了以后我们将全部暴露，那危险是可想而知的。简单商议之后，决定两人一组向四个火力点猛打，然后趁势突上。对方前沿好似有一条长沟，又像是小山坡突起的山丘，正好便于我们隐藏和射击，由于我们处得太近（大约15米左右），对方如果不探出头来是根本打不到我们的，他们若要探出头来射击也是非常危险的，我们抓住这一优势，手榴弹、子弹排炮式地倾向了四个前沿火力点。很奇怪的是，一阵猛打以后，对方非但火力没减，反而从右边楼里的交叉火力向我们这边猛烈地扫射过来，当场就有两人中弹。突然出现的交叉火力配合着四个火力点把我们压在壕沟里不敢动弹，这一突如其来的情况一下把老金和我们搞懵了。最要命的是我们的补给没有跟上，由于大家急于攻下前沿阵地，子弹手榴弹没命地在用，我们现在陷于了弹尽粮绝之中，冲锋是不可能了，撤退的后路也被封死了，后方的高射机枪又联系不上，情况万分危急……

时间一分一秒地在过去，隐约东方已在泛白。火光伴随着使人窒息的火药味，大地显得天昏地暗。头顶上，无数条夺人性命的火练划过那将要黎明的夜空，稍有不慎就有丢掉性命的危险。老金猫在那里，豆大的汗珠从他那额头上顺额而下，他嘴里蹦出一句在当时我听不懂的话：狗日的混凝土工事……“混凝土工事”是什么工事？在六十年代，那时我们都很小，从来也没听说过这玩艺儿，只听说是打不烂炸不烂的工事。难道这“混凝土”就是那炸不烂的工事？现在就是要打要炸也不可能了，因我们已弹尽粮绝。老金毕竟是大学生，他传下话来要我们统计手榴弹数量，一共还有七颗。他说四个火力点是死角不用怕，只等右边二楼机枪换子弹匣的时候，听他口令将手榴弹一齐投向正面两个火力点，然后跳出壕沟滚动身体往后撤……

枪声随着我们的焦虑越来越急，炮声伴着我们的等待越来越响，在生死攸关的时候越着急越想逃离困境反而越是事与愿违。大家心急如焚地等待着，密如蛛网式的千万条火光，腾跃在整个潘家坪上空。时间度秒如分，度时如日，大家都望着右边二楼的那两挺吐着火焰的机枪口，巴不得它换子弹匣。时间一分一秒地在过，我们个个都屏住气拉开架式作最后的挣扎。终于有一挺机枪停了下来，只听老金声嘶竭力一声大吼：“投！”七颗手榴弹顿时飞向了对方。随着爆炸声，大家一跃而起抱着枪顺坡滚落而下。天在旋，地在转，嗖嗖的风声伴随着震耳欲聋的枪炮声，把我们从炼狱里一下抛出……

不知滚了多久，被一个障碍挡住了去路，昏头昏脑地睁眼定神一看，啊，又一位同伴蜷缩着长眠在那里。枪声好像没有那么激烈了，炮声也远离了，筋疲力尽的我，和逝去的同伴躺在荆棘丛生的丘陵里，摸摸胸口，嗯，我还活着。离别死去的同伴，匍匐着向后方艰难地爬去……

天已渐渐放亮，后方到处来往穿梭的人们，经过一昼夜激烈的战场洗礼，早已精疲力尽。不时有尸体运下，又不时有伤员抬来。战地救护队的女同学们汗流浹背、精神抖擞，搀扶着、抬着、背着、安慰着伤员，来回满地疯跑，好像她们有使不完的劲，用不完的力，始终朝气蓬勃。

我拄着枪，一瘸一拐地往前走着，浑身上下感到无比疼痛。原来在冲锋和撤退时，那广柑林里、开阔地带、丘陵洼地到处是荆棘丛生野草遍布，天热穿得单薄，又全神贯注地在打仗，一路摸爬滚打，浑身上下扎满了棘刺全然不知，现撤退下来精神一放松，才感到浑身钻心的刺痛。三个同龄的战地卫生员迎面扑来，一阵嘘寒问暖将我搀扶着走进了重庆市党校里的临时野战医院。

临时野战医院设在院坝左边一排平房里，穿过过道，里面有三四间房屋，每间约四五十平米不等，好像原来是库房。每个房间里密密麻麻挤满男男女女的伤员，站着的、坐着的、躺着的，有的包着头，有的缠着腰，有枪伤有刀伤，还有

缺胳膊少腿的。屋里呻吟声、安慰声、叫骂声、哭泣声不绝于耳……

进去一眼就认出了那个“127”高射机枪射手，他满脸通红，白色的纱布条从头顶到下巴缠了个严严实实，两只耳朵流出的鲜血浸透了纱布，张着嘴在那里平躺着呻吟，痛苦不堪。一问才知道，他是空压厂的一位退伍军人，可能在部队时是高炮手，他掩护我们冲锋，打了一夜的高机，两只耳朵被震得鲜血直流，又没人能替换他，他就咬着牙关一直打到天亮，最后还是4个人把他从炮架上抬下来的，真是英勇啊！我敬佩地看了他一眼，是他们几个高射机枪手掩护了我们冲锋，也是他们掩护了我们撤退……

屋里又闷又热，不时有血腥味夹杂着福尔马林挥发的刺鼻味道扑面而来，原来从战场上运来的同伴尸体就放在隔壁房间里。汗臭味、血腥味、药水味混合在一起，让人窒息。我告诉身边的几个女卫生员，我又渴又饿又累，在屋里长时间呆下去可能不行，她们就将我搀扶到外边，留下两个陪伴着我，另一个一溜烟地跑向了值班室。

一个女卫生员不知从哪里找来一根长木凳让我坐下，在等待医生到来的时间里，我才大致了解到这次战斗的情况：原来“八一五”派为固守自己占据的沙坪坝区，保障该区与市中区之间的道路畅通，打掉位于两区之间大坪、潘家坪一带的“拦路虎”——“反到底”派占据的重庆河运学校、邮电器材厂和潘家坪高干招待所、大坪重庆医学院等，这次“八一五”集中了工人、农民、学生约上千人，分几个阵地同时在17号夜间开始攻打，战斗十分激烈，双方死伤惨重。“八一五”派由于是进攻，相对死伤的人也多，眼看打不下来，所以就向区县要了援军，我们是从北碚抽调来增援的第二批人……

这时我才仔细地打量了一下我的两个女卫生员，高的一个较瘦，矮的一个较胖，穿着军装腰间扎着皮带，那是当时最流行的时髦装束，衣袖挽过胳膊肘，稚嫩的脸庞被战火和重庆的烈日高温熏蒸得黑里透红，头上扎着的两束羊角小辫，早已因一夜的奔忙而乱七八糟。在和我的交谈中，她俩把抢救伤员经历讲得绘声绘色，听着听着，疼痛减轻了一半。此时，另一位女卫生员带着一位医生和护士急匆匆地跑了过来，见我“遍体鳞伤”满身是刺，即刻叫她们将我扶到手术室去。我忍着痛，一瘸一拐地到了手术室。撩起印有红十字的门帘，室内情况惨不忍睹，横七竖八躺满伤员，仅有的三张手术台上早已躺着伤员，室内已无插足之地。医生看了我一眼说：你是外伤，干脆就在外边找个地方挑刺吧！谢天谢地，我巴不得！于是“手术台”就选在了不远处的一个砖头垒起的简易乒乓球台上。

护士从屋里拿来一床草席，她麻利地将席子铺在“手术台”上，又顺势将一张洁白的单子铺了上去，三位女卫生员小心翼翼地将我扶上“手术台”。我艰难地脱去上衣，露出伤痕累累的身躯，她们惊讶地尖叫起来，原来我从脖子到背上、

胸脯、大腿小腿密密麻麻都是刺，背上不知什么时候被什么东西划出的条条伤痕，不时还渗出脓和血水。原以为把刺挑出来就完事，可现在全身是划痕，又有泥沙脓血，就必须清理伤口消毒。我坐在“手术台”上，既不能躺又不能卧，屁股腿上到处都在痛，这下才尝到了伤员的味道。护士拿来棉球棉签，和医生一起用酒精给我清理伤口。棉球蘸着酒精掠过伤痕遍体的身躯，如同针扎般疼痛，我咬着牙紧闭双目不敢吭一声，因有女同学在，要显得我们“勇士”的坚强和不怕牺牲的精神。豆大的汗珠顺额而下，身体在酒精的涂抹下不停地颤抖。恍惚中隐隐感到阵阵凉风，微睁双眼，两个女卫生员正用纸块在给我上下扇动，另一个用棉签正在协助医生护士给我擦着伤口，我强忍着疼痛，庆幸自己没战死沙场或缺胳膊少腿，很万幸了……

近两个小时的折腾，医生护士从我身上取出大大小小泥砂荆棘几十颗，黑麻麻地放在手术盘里。我如释重负，长吁一气。远处传来急促的呼叫声，三个女卫生员闻声而去……

休息片刻，感到全身轻松多了，我告别医护人员，打听着回到了北碚参战队伍驻地。来到我们班里，见大家蓬头垢面，七歪八翘地躺在地上睡着，还好，九个人一个不少。大家一言不发相互看着，个个像打败了的公鸡，耷拉着脑袋，完全没有了战前的锐气。

吃过午饭，有人把我们带到一间屋前，和一个大个子军人模样的人说了些什么，回头提高嗓门对我们说：“大家去补充弹药，今晚继续攻打昨晚对方阵地……”进得屋里，枪支弹药堆得满满的，我们按正规装备完毕，拖着疲乏的身子回驻地休息待命。

太阳悄悄地落下了西山，被它烤灼了一天的大地散发出蒸人的地气。休整了一天，大家吃着送来的饭菜，谈论着昨晚的战斗细节和今晚的再次进攻，似乎又信心百倍，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天刚擦黑，指挥部吸取了昨天的教训，改变了战略战术：用学生做第一梯队，工人做第二梯队，随后是农民兄弟。大意是重火力轰击 20 分钟以后，第一梯队正面发起进攻；第二梯队紧随其后向两边迂回包抄；第三梯队做为补充全线压上，争取一鼓作气拿下潘家坪。大家磨拳擦掌誓言今晚一定要取胜，为死去的战友报仇！

激战前的场面又出现在眼前，所不同的是，在隆隆的坦克车身后多了两门“37”炮和一挺“145”高射机枪。一场你死我活的大战将在几小时后再次打响，我们静静地等待着……。

大约晚上九点钟，我们后方一阵骚动，大批人员奔跑叫喊着，不知出了什么事，大家一阵紧张。是“敌人”来袭？是内部有变？还是在调整部署？大家全然不知。一般情况下，我们侦察班得到的消息和情报都比别人来得快而准，然而，

我们却一无所知。

正在纳闷之时，只听有人在喊：北碚来的各部队马上上车另有任务……这一声吼非同小可，几百号人全都炸了锅，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另有什么任务？我们侦察班在学生队伍最前面，理应最先得通知。另有任务？我们怎么不知道？此时，“捍红总部”的另一个指挥员（后来才知道带我们来的老金已经受伤住进医院）急促地跑过来对着一梯队驻地大吼：“撤出阵地赶快上车，快！快！快！”刹那间没有了犹豫没有了思考和疑虑，稀里糊涂的几百个人向停在不远处的卡车飞奔而去。有人已在那里汗流浹背指挥着大家上车。乱作一团的人们争先恐后见车就爬，完全乱了阵脚……我们爬上一辆车，已经不再分先后秩序，塞满一车就走。车在黑夜中风一般地疾驶而去，大家紧张地揣摸着，神经质地紧握着手中的枪，瞪大眼睛任凭卡车摇来晃去……

约摸过了一小时，车停在了三溪口，前边传过话来：不要下车，就地待命！大家紧张地站在车里，这才反应过来：我们已是在返回北碚的路上了。但为什么这样急匆匆地离开？谁也不晓得。又过了半小时，前边再传过话来：下车就地休息待命。大家下得车来围坐在一起面面相觑不发一语。静了片刻，好像气氛没那么紧张了，此时才有了喝水的、撒尿的、相互寻找的、打听情况的……大家低声议论着、猜想着……

又不知过了多久，上面再传下话来叫大家上车，此时大家已经不紧张了。车在弯曲的公路上，沿着嘉陵江边缓缓地驶回了北碚驻地。

后来才知道，因为中央调查组已经到了重庆，警备区严令双方停火。

不久，中央“九五命令”下达，两派交枪，谈判大联合……

日月如梭，转眼四十七年过去了，我们也已两鬓霜染。每当我来到重庆沙坪坝公园，总是情不自禁地要来到那一处文革“烈士陵园”转转，因为那里有曾同我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有熟悉的兄弟姐妹，那为了捍卫毛泽东和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冤死的数百冤魂……这血腥的一页已经翻过去几十年了。但我脑海里经常会像过电影那样闪回那些惨烈的场景……我经常在想，我们那些英勇战死的“战友”，受伤致残的同伴，以及我们冒死冲杀所流的那些血，到底有什么意义？

2014年6月10日再修改

【生逢乱世】

血色残忆

牟群

我从小有个毛病，见不得血。我小时候家住在城市中最热闹的大阳沟菜市场附近，每次经过，看见那些杀鸡宰鸭剖黄鳝的血光，便头昏目眩，面色苍白，有时见院子里孩子打架，一拳打在鼻梁上，血流出来，被打者还未怎样，我先昏了过去。我妈是内科医生，带我到医院里，蒙住我的眼，抽血检查，我虽看不见，却想象着自己的鲜血正被那万恶的护士缓缓地抽去，仿佛听见那血唧唧地往那针筒里吸，便人事不省了。后来检查结果出来，什么毛病也没查到，我妈说这是个病，叫“精神性休克”。我问其所以，我妈说是因我性太善，心太弱，见不得听不得凶残、血腥之事。然而，我却偏偏遇上了血腥的文化大革命。

人生所见的第一幕悲剧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那阵，我十三岁。刚进入重庆市第二十五中学上初一。伟大领袖一声令下，全国山河一片红，整个学校成了大字报的世界。所有的墙面全贴满了，又在操场里纵横的绳子上挂满了大字报，每个班级以大字报为围墙，各自在自己的单位中斗争着自己的老师。

我的班主任名叫孙剑瑜，浙江萧山人氏，生得牛高马大，身高1米9，一双大手可以将瘦小的同学提到半空。平常除了教地理课外，还偶尔教同学们弄弄拳脚。当斗争成为时尚时，同学们合计如何找出他的“反动言行”，数罗了半天，终于抓到一条“现行”，于是给他贴了如下大字报：

“反动地理权威孙剑瑜，在上地理课时，给同学们灌输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思想，在讲新疆地理时对同学们说，新疆维吾尔族姑娘最漂亮，既具有东方人大眼睛的特色，又具有西方人高鼻梁的特色……”

轮到斗争时，初一年级的半大娃儿却谁也不敢上去架孙老师的“喷气式”。最后孙老师说：“没什么事了罢？现在下课……”于是作鸟兽散。

许多年以后，我才明白，每个人都有邪恶的基因，在那种群体的潮涌中，在那种意识形态化的权威崇拜中，邪恶的基因，倚仗着光明真理的说教和煽动，随着趋同的潮流而迅速滋生、膨胀。看着平时板着脸的班主任顿时改换了角色，成为全体先前被教训者的标靶，心中顿时产生自由的亢奋，反抗与解放的陶醉。其实这就是法西斯精神和斗争哲学的潜在或公开灌输。文革给每个中国人灵魂中灌输的对残忍、非理性事物的麻木真是怵目惊心，危害深远。

就在操场上挂满大字报的那几天，我见到了这一生中第一幕悲剧。后来在下乡时读到鲁迅的悲剧学说：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撕碎了给人看。尤其体味良深。那正是一种美丽的陨落：24岁的政治老师孔繁蓉，被史无前例的口诛笔伐折磨

得尊严尽失，生不如死，毅然从五楼窗户跳下，头部触地，当即死亡。

我们那时还没有停课，在听到一声巨响和一阵惊呼后，我随同学前去围观，只见孔老师脑浆涂地、鲜血四溅，那鲜红的放射性血迹犹如一幅中国地图，在我此生的记忆中永远不能抹去。她那 24 岁的生命，化作了一缕冤魂，永远飘弋在这块土地和天空，乞求寻找着一个答案。

我望着孔老师蜷曲着的美丽身躯，竟然没有头昏眼花，犯那精神性休克的毛病，只是生出满腹疑惑。那鲜血化成了一团红色的迷雾，遮住了我的双眼。

城里的血战

事态迅速朝动乱发展，学校停课了，我们都回家去接受随时将来临的暴风雨的考验。武斗逐步升级，在我家附近开始了两派革命者的火并。那场景丝毫不比好莱坞古代战争大片中的场景逊色。数百人的队伍两军对阵，正面交锋。前面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中学生，后面是要消灭一切反动派全无敌的革命军。高喊着“为毛主席而战，完蛋就完蛋！完蛋就完蛋！”的口号冲向对方的阵营。刹那间血肉横飞。我远远地看着一位青年战士，肠子被挑了出来。他的战友们一边抵挡对方的攻击，一边为其捂住流出的肠子……

武斗愈来愈升级。兵工厂的革命工人开出了坦克和自行火炮。入夜，长江上空对射的机枪炮弹犹如国庆之夜施放的礼花焰火。

院子里穿开裆裤时就一起玩的哥们儿钱兄，是造反派红卫兵的战斗队一号勤务员（主要负责人），他从小摆弄无线电机械就是一把好手，当时亲自驾驶着苏制嘎斯汽车，满载革命战士遍街兜风。兄弟们都钦佩不已。却不料被对立派抓获，一阵毒揍，为了获取更高情报，留了一条性命，关入土牢房。这哥们儿宁死不屈，半夜撬窗越狱潜伏回家。九死一生亡命天涯的钱兄今天和我一样成了大学里的教授。

后来与我在一个村插队并在一个工厂里混了六年的生死哥们儿袁兄，当时是对立派的通讯员。因执行革命任务，企图蒙混过关（武斗哨卡），未料喊错口令，被对方革命小将狠插屁股数刀。后来当了工厂的总工程师兼党委书记，被哥们儿称为把革命历史铭刻在屁股上的思想工作者。

我的妻子，当年还很小，在长江边的一个工厂子弟学校读书，学校和家属区的孩子们仿效大人，以武斗为乐事，用铁丝做成的弹弓子弹相互射杀。在一个命定的时刻，一颗邪恶的铁丝弹使后来成为我爱妻的小姑娘永远失去了一只明眸。20 年后，当她成为中国最优秀的服装设计师之一，代表祖国去巴黎参加展演时，传媒说她那失去的一目早已退回生命的内部，因而获得了独到的观察。当不幸成

为最强的动力之时，返观历史，我的妻子认为只有爱心和美感能够洗尽社会整体的污秽和每个人心中的邪恶。

学校的武斗队装备日新，由钢铁棍棒变成了半自动步枪、冲锋枪、四联高射机枪。武斗队的少年经历战斗的考验，稚气的学生脸上都冒出了草莽英雄的神色。一日，我返回学校（此时被称作“据点”）时，见到武斗队员们在学校花园里挖坑活埋一条瘸腿狗，这条狗也是战俘，被唤着“二轻”——这“二轻”乃是对立派的一个组织名称。那狗被埋没顶，又从土中挣出口鼻来，发出最后的哀叫，却被武斗学生一枪托打去，结束了可怜的小生命。队员们则在一边嘻笑作乐。

回想那场景真是令人惊悚。“哀莫大于心死”，风华正茂的少年全都死了爱心。其实民族的悲剧，从夺走“二轻”生命的那枪托举起时便已命定。而今那些武斗同学的子女已不止他们当年的年纪。不知他们有没有向子女忆述“二轻”的死？

这个问题长期困扰着我，后来我终于写了一首歌，歌中唱道：“你难道没沾过血污？你难道没迷过心窍？走过的路都忘记了，全都忘记了。阳光下，你在孜孜不倦地教给孩子们做人的诀窍……”

在重庆沙坪坝公园内有一处文革武斗死难者墓地，这里埋葬的都是不知该去天堂还是该去地狱的灵魂。文革已过去几十年，对此波及每一国民灵魂肉身的人类浩劫，全民无祭，全民无省。由于没有人去做灵魂定位的工作，以致游魂永远无法超渡。每年清明，墓地里还有寥寥几位难以释怀的亲友，前来放上几束鲜花。

在这墓群中，埋葬着我的一位同学，墓碑上曾写着（现已大部风化）：

邵大海烈士，男，出生于一个普通劳动人民家庭，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敢于革命，敢于造反，是坚定的八一五战士。为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于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三日自卫反击战中，身中砸派数弹，壮烈牺牲，享年十七岁。

据说，他是在攻打对方有名的“完蛋就完蛋”广播站（当时设于解放碑旁的交电大楼）时，自告奋勇抱炸药包去炸那楼下的铁栅门而中弹身亡的……

矿山战火

我终于在城里呆不下去。便回到父母身边，那时，我父母已被调去离城市百余公里外的南桐矿区总医院工作。

城里的战火暂时还未烧到矿区，这里还有世外桃源的清静，每天，我和哥们儿王兄背着钓竿筩篓去钓鱼，钓遍了矿区的河。登高望远横竿赋诗，引经据典纵论天下，或聚众雅乐吹拉弹唱，此乐何极！

战火说来就来。1967年8月底的一天傍晚，哥们儿正在院后冲凉，突然开来了几车武斗战士，以纵队方式抄向矿区行政中心，霎时枪声大作，城头变幻大王旗，矿区也进入了战争状态。

入夜，家门口穿梭着巡逻车。王兄正开门时，一排机枪扫来。弹洞家壁，侥幸捡了一条性命。从此家家门窗均用棉絮遮得严严实实，酷热难耐，夜里实行灯火管制，全家老少蜷伏家中，围着烛光，听着时稀时密的枪声。度日如年。

前线拉了伤员下来。深夜，武装队员到家里来敲门，押走了“反动医学权威”的父亲。医院院内和手术室外到处是荷枪实弹的武斗队员。做完手术后，父亲又被押送回家。家父从来精力充沛，达观乐世，而此刻，我看见他前所未有的抑郁。其实自从他任职院长以来，就一直未释重负。

在我初初醒人世的眼里，还见到过一幕凝重沉闷的图景：沥沥细雨中，李井泉（西南局第一书记，当时被称为“西南土皇帝”）和任白戈（重庆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被革命群众押在解放牌汽车货厢上，蜷曲着像两个死囚，雨水透过简陋的车棚浇湿了他们，冷得直打哆嗦。这是省市范围的巡回游斗。车开到了医院，让院长医生验证反革命黑帮走资派们是否真的生了病。出于革命的人道主义，革命战士们同意医生们的诊断。停止批斗，押回城里医治。

一天半夜，矿区革命组织的头目急敲家门。带走父亲。第二天晚上才回来，脸上写满了悲哀。却原来，被批斗的矿区最高走资派（后来成为这个城市的市长）家的孩子落入蓄水池中淹死，打捞起来时已经无法可救，其父正在接受批斗。父亲随干部勘查了现场，觉得那孩子怎么也不会自己掉入水池，他杀的可能性极大，但那时甚至无法去立案，巨大的悲痛中只好无言地忍耐。文革悲剧是整个民族、社会、国家的悲剧。承受苦难的是中国每一个家庭——无论是百姓，还是高官。

矿区有一处险境，控扼要津。山上山下，两派各据，中间有缆车上下交通。因革命而停了生产后，缆车中断，唯余千阶石梯钩连。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战斗打响，久攻不下，死伤甚众。遂有一特种兵转业军人，手提机枪，竟然顶着火力封锁，迂回攀登，英雄孤胆拿下了高踞的对方据点。对方不是“一夫当关”而是一巾帼守卫，妙龄红颜，号称“铁娘子”，此时仓惶逃窜，至一农舍，以双枪逼住农户，藏匿粮仓之中，孰料这农户乃是对立派农民革命军战士，遂行举报，捉拿于胜军帐下发落。“铁娘子”竟被绑住手足从千阶石梯推摔而下，血肉模糊，命悬一线，胜军战士同仇敌忾，众皆喊“杀”，可怜红颜英雄又被补刀补枪，最终香销玉殒。

一天夜里，我陪母亲在值夜班。中夜，在惨白的灯光下，门诊部廊道尽头缓缓爬来一个人，我急忙唤来当班护士，架起此人。只见周身是血，大腿上插着一把三棱刺刀，鲜血还在往外冒。已经把裤子浇湿贴在腿上，足下胶鞋也浸透了。

此人用尽最后力气爬进门诊部便昏死过去。听我妈说，这是股动脉被刺破了。

我看着护士们用镊子把纱布捅进伤口，又抽取出来，深深的伤口就如死亡的洞穴，显然是刺刀扎进去后又残忍地搅了几转，扩大了伤口……我终于忍不住又犯了精神性休克的毛病，母亲急忙命护士拿来葡萄糖液和药物为我注射，躺在门诊部的长椅上。我默默祈祷着血光之灾早早结束。

一次规模最大的出殡

两派革命群众为捍卫最高领袖的革命路线拼杀僵持已久。终于传来了最高领袖的声音，要求停火交枪大联合。人们欢欣鼓舞、敲锣打鼓，响应中央的交枪令。哥们儿这才过足了枪瘾，我也拿着冲锋枪对天狂扫，狠不能将所有的子弹全打完。

不知哪位哥们儿送我哥一把不知是英国还是德国造的勃朗宁手枪，那是军队中高级首长的防身武器，闪着阴冷的寒光。我哥翻来复去，躲在煤棚中欣赏了个够，生怕父亲发现，偷偷用油纸包好，埋在煤棚地下。却不知怎么被父亲知道，硬逼着挖出来交上去了。

终于又可以去河边钓鱼了。一天，我和王兄正在河边守竿，却惊见河中缓缓浮来一具尸体，那是一位壮汉，仰面朝天，双手被铁丝紧紧捆着，做抱拳状。我们屏住呼吸，心惊胆战，看着这位壮汉浮过面前，飘向下游。他是谁？死于非命，还是死有余辜？……在这青山绿水之间，人的生命贱如草芥。在这天地环宇之间，凄厉的悲声总是伴随着“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越来越好”的宣传久弥不去。

父亲常说那些日子是祸不单行，风疾云骤，担惊受怕，惶惶不可终日。当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得到响应，矿区又开始复工。没多久，又一场巨大的惨祸降临：一个矿井瓦斯突出，83位当班工人无一幸免！

那摧肝裂胆的汽笛声，那穿梭飞驰的救护车，任何此类电影场景不能模拟。虽然是生产事故，但不断的“抓革命”不仅未能“促生产”，反而使矿上必要的规章制度遭到破坏，“政治第一”取代了“安全第一”而招致灾祸发生，这却是不争的事实。

作为矿区子弟，哥们儿都参加了抬尸、扎花圈、布灵堂的工作。而那些正在牛棚的“走资派”与“牛鬼蛇神”，则被押去擦洗死难工人的尸身，因尸体太多，太平间远远不够。医院的院坝中搭起临时的芦席大棚，惨白雪亮的灯光照在排排尸身上。因瓦斯破坏肺部的原因，尸体从口鼻中往外冒泡。看上去很恐怖。那些“走资派”和“牛鬼蛇神”流着泪，默默地为死难者擦去脸上的气泡，死难工人的家属守在自己亲人的身边，撕心裂胆地哭。

木工车间昼夜加班，赶制出83具棺木。送葬出殡那天，寒风凛冽，纸钱和

祭幛随风漫卷飘洒，直到天边。由数百位工人和“走资派”、“牛鬼蛇神”抬着83具灵柩，浩浩荡荡的队伍蜿蜒直上矿山的坟岗，悲痛凄凉的哭声在山谷里回响……

对这段染血的历史，教科书上几乎绝少提到。这才是我们最大的忧患。

当我们义正辞严地告诫日本政府中的右翼分子不要歪曲、抹杀侵略中国屠杀人民的血腥历史时，也应对我们自己历史上的血色教训正面书写，记录在案，以告诫中华子孙万代，切勿蹈此复辙，扭曲民族心灵。

【生逢乱世】

河街居民遭遇“八八海战”

刘世秀

按：本篇为作者回忆录中一节。作者文革爆发时为重庆市第二十中学（今育才中学）高六七级五班学生。

红日高照、万里无云。倚窗眺望，两江波光粼粼，航船行驶江中，偶闻汽笛长鸣。汛期的长江，席卷着沿途泥沙，如脱缰的野马，一泻千里、滚滚向东而去。

一九六七年八月八号，一个看似平淡无奇的日子。中午饭刚下肚，一位来客大步流星气喘吁吁地登门，他是我父亲在长航共事数十载且为挚友的刘姓伯伯之妻弟曾昭明，我从小就尊称他为“二舅”。按年龄，他仅比我大几岁，是往届高中毕业生。他虽年轻，但见多识广、聪明睿智。在河街那群知识浅薄的娃娃眼里，他就是一名“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娃娃头。

“五嫂，不好啊，今天必有大事发生！”二舅焦急万分地对我母亲说道。我素来循规蹈矩、辈份分明，从不轻易插嘴长辈间的谈话，此时也忍不住打破常规上前追问缘由。

母亲瞥了我一眼，没吭声。二舅转而面对我说：“我观察半天了，停泊于江北沙嘴嘉陵江心那艘‘人民28号’登陆艇有异常情况。长航交通船往返其间，整整忙碌了一上午，不是运武器又是运什么？说不定朝天门水域要打仗哟……”

临走时二舅再三叮嘱：“多加小心哦，注意安全，要防患于未然才好。”我们母女俩点头称是，在惊慌中带着一脸苦笑送走了二舅。

我觉得其分析与判断不无道理，但又心存侥幸。但愿老天爷保佑逢凶化吉平安无事。那日下午，我早将中午之事忘得干干净净。

临近傍晚，日头西斜，人们依然大汗淋漓。河边长大的孩子，几乎无不会游泳者。不分男女老少去河里洗澡退凉是河街人在热天里的历来习俗。此时江中人头攒动，浪里白条穿梭扑腾，人们在水中嬉戏打闹，尽情享受夏日里江水带来的清凉。岸上炊烟袅袅，家庭主妇们正忙着做饭准备与家人共进晚餐。

谁也没有注意到，一江之隔的红港（朝天门码头），此时炸开了锅！八一五派的高音喇叭传出急促、铿锵有力的动员令：“请大家注意，国民党‘望江 101’轮正向我红港逼近！立即行动起来！……”话毕，高音喇叭里又响起浑厚有力、鼓舞人心的战斗进行曲。

随着这一声令下，原泊位于红港沙嘴、嘉陵江心的登陆艇“人民 28 号”立刻起锚，劈风斩浪驶向长江水域，朝南岸玄坛庙 1018 趸船靠近。据二舅事后所述，“‘人民 28 号’除两侧甲板上设置有数挺高机外，甲板上还整齐地列队着精神抖擞的船员……”此刻他们俨然成了严阵以待、视死如归的海军战士！他们正准备浴血奋战、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阻击援军西上的“闯关之敌”！可他们做梦也未曾想到，等待自己的将是何等可怕的灭顶之灾！

紧跟“人民 28 号”之后的是马力不错的“长江 604”轮，它开足马力、匆匆溯江而上，驶向望龙门上游处的水域、可能是准备设置另一个阻击点。“长江 207”轮亦驶向东水门水域，准备迎敌。

与此同时，反到底派的“望江 101”轮也正从下游乘风破浪、首当其冲朝红港方向驶来，它要为身后的“人民 5 号”运输船护航、闯关。

“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海战”即将打响。然而河街及江水中的人们却浑然不知！那些只顾在河水中扑腾玩耍的孩子们，只顾围着锅台转的家庭主妇们，竟无人在喧闹声中察觉到这即将发生的战事。

只有二舅才敏锐地洞察到了这变幻的风云。他大声疾呼：“你们莫游泳了！赶快起来！马上要打仗了！”见河中仍无动静，急得他不断声嘶力竭大吼他弟弟：“昭荣，你们哪个还不起来？！‘人民 28 号’都开过来了！马上要打仗了！”

这报警信号终于惊得众人扑腾着奋力游向岸边。来不及擦干身上流淌着的江水，也来不及穿好衣裤，任凭全身湿漉漉地一窝蜂直往河街狂奔。可江水中还有数名来不及上岸者，其中包括二舅的弟弟在内。

慌忙上岸跑在前面的唐氏三兄弟，如离弦之箭、一路水淋淋奔回“高坎子”家中，二舅随即亦紧随其后。

此时的红港变得异常寂静，“望江 101”轮已在弹子石斜石水域出现。当它行驶至长江与嘉陵江汇合处的呼归石水域时便停下，一面警惕地密切关注前方红港的动静，一面耐心静候它身后的“人民 5 号”登陆艇的到来。“望江 101”轮全神贯注所防的仅是红港岸上设置的火力点，它也许未曾料到红港八一五的火力

点是设置在可移动的“军舰”之上！

突然，一声清脆响亮的信号枪声划破长空，“八八海战”就此正式拉开了序幕。不知是何方首开第一枪，至今为此仍存争议。但有人耳闻目睹，信誓旦旦地说：那第一枪来自呼归石那艘“望江 101”。

我正在家里吃着晚餐，对外面所发生的一切全然不知。突然，窗外响起一阵震耳欲聋的咚咚咚声、清脆响亮的哒哒哒声、子弹打在钢板上所发出的金属叮当声……哎呀！这不是枪炮声吗？怎么听声音如此近？

我情不自禁将头伸出窗外，随即便惊出一身冷汗：上午还停泊在嘉陵江心的登陆艇“人民 28 号”，不知何时已窜到南岸玄坛庙水域，且就在我家窗外！因汛期水涨船高，船身几乎与河街楼房齐平。

毋庸置疑，我们已置身于海战的主战场！这可怎么好？我愣在那里久久不能动弹。

“人民 28 号”与“长江 207”拖轮紧密配合，在波涛汹涌的长江上摆开了一字阵势，前者在南岸玄坛庙水域，后者在市中区东水门水域。它们欲横江拼命阻击溯江而上的船只。因反到底派的“人民 5 号”登陆艇担任运输物资的任务，故具有武装战斗力的护航舰“望江 101”便成为八一五派长航兵团重点阻击对象。

咚咚咚的炮声不绝于耳，它来自于突围、闯关的“望江 101”轮；那密集的哒哒哒高机声显得底气不足，它来自于长航的两艘阻击船。

枪炮声中，我脚下的吊脚楼发出阵阵剧烈的振颤，使人头皮发麻。又一阵咚咚声使我如梦方醒：“必须立即逃离现场！”甩掉手中的筷子，伸出右手拽紧饭桌旁呆若木鸡满脸惊恐的老母，用左腋夹住别人托养在我家的两岁小男孩，跌跌撞撞地夺门而逃！

满街是奔逃的难民，突发事变使人们如惊弓之鸟慌不择路，藏身之处究竟在何方？六神无主之中，大脑一片空白，唯有随大流。出门往左拐，顺着河街一步一颠艰难前行。枪炮声密集，炮弹在空中呼啸而过。若经过有建筑物遮挡之处、纵然是木质建筑物，也顿觉有了安全感，其实那些建筑物在炮弹下也是不堪一击的朽物！

好不容易前行了约二十米，头重脚轻，额上渗出汗珠，喉头堵得发慌……还好，终于撑到了“土地庙”，猛然想到坎后有一条阳沟，干脆不妨到那里躲躲。右转抬脚上了石梯，硬撑着将老母拽了上去。枪炮声仍响个不停，感觉大地在震动。街上已无路人，料想他们早已逃至安全处避难。

家住阳沟边的陈素清孀孀（因早年掉了多颗门牙，街坊中有好事者赠其“缺牙巴”的绰号），面对漫天横飞的炮火，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还在那里若无其事地清洗衣服。这年过半百的老妇人，仅比我母小几岁。两家曾多年同在一个屋檐

下，共住一套木质捆绑“跃层房”，两家共用一间厨房兼饭厅，我家住楼下，她家住楼上。数年和睦相处、彼此照顾亲如一家。

她抬头见我母女二人惊慌失措狼狈不堪的样子，先愣了愣，立刻又满脸堆笑地调侃我老母：“老堂客呀，慌啥子嘛？你看我都不慌。等我把水倒了移开盆子，你才下得去呀……。”两位老人素有玩笑开，但我母亲此刻哪有闲情开玩笑？

那阳沟深不足一米五、宽约一米有余。“缺牙巴”迅速倒掉水、移开盆，然后双手搀扶着我母亲，小心翼翼地协助我母下到沟底。

顺沟前行约八米再左拐，眼前的情形令我目瞪口呆：老天爷，那十多米长的沟中早已塞满整整一沟人！男女老幼全蹲在沟中。好在后沟无住家户，故沟底干燥无污水。邻居中有头顶厚厚棉絮或被盖的，有双手紧紧抱头的，有埋头遮面、将头深深贴在地上的，有蹲在沟里将脸死死贴在膝盖上的……

我母子在人群中见缝插针蹲下。乱飞的子弹发出刺耳尖叫，炮弹发出令人闻风丧胆的咚咚声及呼啸声……我怀疑此处亦非安全之地、开始担心起来。恰巧身旁有块脸盆大小的薄片石，我顺手拾起挡住脑袋，以为可以挡住流弹的袭击。母亲蹲在身旁没哼声，情绪稳定了许多。那两岁多的小儿郎倒也十分乖巧，自始至终没有哭闹过。因人太小，他也许还不懂得害怕二字的含义。

从枪炮的密集声中可知战斗仍在继续进行。除了枪炮声及人们急促的呼吸声外，周围是死一般的沉寂。

后来得知，交战中的红港客运站大楼被已被“望江 101”轮开炮击中，先前发号施令的高音喇叭也沉默不语，估计是遭炮击已被摧毁。虽然“人民 28 号”与“望江 101”双方对阵互相攻击驾驶室，但前者高高矗立的圆柱形驾驶室未作防弹处理，结果指挥部被彻底摧毁。船在江中晕头转向直打转。接着“望江 101”轮乘胜追击、迅速调低炮口高度，专轰“人民 28 号”轮的吃水线，致使该船吃水线连连中弹。

玄坛庙水域鏖战激烈，反到底派的“人民 5 号”得以趁虚而入顺着红港沿岸的水域溯江而上。“望江 101”见“人民 28 号”已丧失战斗力，急欲驶离与运输船会合，大概担心遭遇伏击，从泊于玄坛庙的 1043 趸船与下游的 1018 趸船之间这片水域小心谨慎地迂回靠近 1043 趸船，欲以此趸船作为躲避敌方阻击的掩护屏障。于是该护航舰便加大马力企图撞毁趸船的跳板，由趸船内舷沿河岸朝上游航行。但几经努力却徒劳无功，只得照原水路退回。

谁知它退回原路刚露头，便与长航兵团的另一艘登陆艇“人民 30 号”迎面撞上。该艇究竟是来阻击“望江 101”或是施救已遭重创的“人民 28 号”？不得而知。不过，它立即遭到“望江 101”劈头盖脑一阵炮轰，吓得它迅速调头开足马力朝嘉陵江方向逃遁。而“望江 101”无心恋战，抓紧时机去追赶“人民 5

号”。——当然，这些都是事后二舅讲述的。

河街避难的人们度日如年，不知过了多久，枪炮声才逐渐稀疏，由近而远，偶尔可闻零星炮声。“停战了！”我内心欢呼着，跃跃欲试想爬出沟外去探个究竟。

我第一个爬出沟沿冲下石梯，来到寂静无人的街上。但见“长江 207”轮尾部拖着冲天大火及滚滚浓烟，随水漂流早已过了呼归石水域，此船明显已无动力。但船上仍枪声不断，有八一五战士在顽强抵抗。

我就奇怪，原本在东水门水域并未进入南岸玄坛庙水域参战的“长江 207”又是如何中弹起火的呢？难道它是被运输船上的火力击中？眼见风助火势、越燃越旺，它也随波逐流渐行渐远。突然从江北打渔湾、梁沱之间又冲出数艘船紧随其后，据说在白沙沱才终于将火船追上并拦截住。

“人民 28 号”登陆艇已歪着船身搁浅在呼归石与野猫石之间的河岸边，吃水线处中弹，必沉无疑。

“望江 101”已离开玄坛庙即将驶过上新街水域，正以胜利者的姿态，大摇大摆劈风斩浪，一路拉响了壮行的汽笛溯江而上。它时不时还盛气凌人地发出几枚三七炮弹开道。

事后二舅说，该轮炮轰“人民 30 号”后去追赶、会合运输船，在途经上新街那片水域时，遭到驻上新街的南岸粮食公司八一五派高机阻击。“望江 101”轮随即回敬了数枚炮弹，顷刻岸上的火力便哑了。枪手与二舅是同事，见面时惊叹曰：“我险些命丧黄泉……”

至于那艘交战前开往望龙门水域方向的拖头“长江 604”轮，似乎被失败的战局吓晕，始终未曾听到它放一枪一弹。

终于可以回家了！人们从四面八方钻出来，灰头土脸地涌向各自的家门。人们最关心的莫过于炮火中自己的窝还安在否？

待元气恢复后，街坊邻居彼此又兴致勃勃地大谈所见所闻。有人说牟四娃子家的衣箱里睡着一颗三七炮弹头，幸好没有爆炸（“八八海战”中使用的三七炮弹是试炮用的填砂弹，不爆炸）；二舅说他家的房领子有根柱头被炮击穿一个大洞，且在河边还拾得多枚海三七的炮弹头；他后栋楼的邻居莫家瑞伯伯家里的床也被炮弹击中损坏；高坎子家的申伯伯在自家后阳沟里自搭掩体，全家老小躲过了这次灾难；左侧坎上的李仁义全家，冒着纷飞的炮火，借道申家后阳沟，翻坎越坡才逃离危险之地；二舅最先发现险情躲在唐氏兄弟家里，但他的妹妹曾昭玉却来不及撤退，竟然头顶箩筐蹲在灶坑旁躲了半天；河中未来得及上岸躲避者，有的躲在 1018 趸船后面的木驳舵叶上，有的躲于水中、手抓船舷的靠把（一种缓冲船之间碰撞的装置）；还有很大一部分左邻右舍在临街一防空洞中躲避……唐氏几兄弟与二舅在退伍军人唐老大的指挥下，在自家搭了简易掩体，从窗口往

外从容不迫地观看完“八八海战”全过程，他们逢人便不无自豪地说：“我们才是八八海战的真正目击者！”

据说“望江 101”原为四川军阀刘湘的军舰，解放后望江厂将其作为普通交通船使用。反到底派根据实战所需，由一群训练有素的复退军人、将其重新改装成为一艘攻防兼备的战舰，他们对其驾驶室进行了防弹装甲钢板焊装处理，为加强火力设施，该船的首尾均配置了炮位。虽他们所用的海三七炮弹是弹头并不爆炸的试炮弹，但仍具有不小的杀伤威力。

八一五长航兵团虽然派出了三艘阻击船，但毕竟只有高机而无炮，且参战人员仅是普通船员。为养家糊口，船员们长年累月离开陆地，在青龙背上玩命均平安无事。却不料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动乱中，人祸却使数名海员魂断长江、饮恨九泉！

事后不少野猫溪附近的年轻人曾登上“人民 28 号”观览，红港长航兵团高音喇叭多次提出严厉警告：不准私自登船，否则将开枪……最初上船者拾得很多长方形的铝合金饭盒及香烟等。那个年代的人普遍较循规蹈矩、老实单纯，没多的歪心眼。我惊叹竟无一人欲发国难之财，染指船上值钱之物，包括保险柜等。有胆大之人曾进入驾驶室，据说现场触目惊心，其玻璃窗皆被炮轰得粉碎，驾驶室内遍地狼藉、血流之多，令人不寒而栗。

从此，我再无缘见到“长江 207 号”拖轮，它遭此重创，也许没有任何修复利用价值而被彻底报废了；“人民 5 号”后来停泊于南岸慈云寺附近的重庆长航局航修站河边；报废的“人民 28 号”后来停泊于南岸弹子石的斜石岸边，长航局曾将它作为“七二一”工人大学的教学船。

“八八海战”结束后不久，面对重庆大规模的武斗升级，二舅与唐氏兄弟结伴去成都避难。在异土他乡，每当他们绘声绘色地向人们讲述“八八海战”的见闻时，便会立刻引来众多蓉城听客，以至于有餐馆老板还因此而为之提供免费饮食。

日月如梭，斗转星移。近半个世纪过去，回忆此事，仍历历在目，不堪回首！对这场“全面内战”中的“八八海战”，无论是参战者或是目击者，你会忘记这血淋淋的一天吗？至少我不会忘记！那场人为的浩劫，给多少人留下了永远抹不去的阴影。我为这些死去的无辜者悲哀，也为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悲哀！

愿逝者安息，愿国家永远安定、团结、和谐。

2009.6.3 初稿

2014.5.21 定稿

2014.5.29 补充修改

一个痛失爱子的父亲的日记

黄顺义 提供 庞国义 录入

录入者按：1967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九五命令”下达后，在重庆“八月战争”中动用现代化热兵器打得不可开交的两大派暂时停火，在驻军督促安排下，开始上交武斗中使用的各类常规武器。9月15日，市中区南纪门中学（文革中改名“东方红中学”）八一五派成员，奉命集中到凯旋路中学（文革中改名“红岩三中”）向军分区上交武器。因一名学生挂在腰间的手榴弹被意外拉弦后慌乱中扔出，致使在场的南中初三学生陈其燕（17岁）和凯中女教师郑永淑（44岁）被炸身亡，多名解放军战士受伤。

“十七年华成逝水，百载椿萱犹哭痴”，陈其燕的父亲（时为重庆市财贸工人八一五战斗团成员）在事发后的300多个日日夜夜，思子心切，用笔真实地记下了这场意外事故给自己和家庭带来的巨大精神伤痛。

长期坚持不懈收集文革史料的黄顺义先生，在重庆市收藏品交易市场意外发现了这本自题为“悲痛的路程，伤心的记载”的珍贵日记，花钱买下后慷慨提供给研究者参考。为方便阅读，录入者对日记进行了分段和标点符号处理，订正了少数明显的错、漏字，个别实在无法辨识的字用□代替。这里发表的是部分摘录，标题是另拟的。

1967年9月29日

火车在误点四小时之后，终于到站了。自8月15日离渝至京，至今已一个半月没见到声及孩子们，我多么高兴要看到他们，而且庆蓉和家骅也在重庆，多么难得啊！我的心是多么激动啊！我知道他们一定会来接我的，这亦是“战后”重逢啊！我出站时就尽力搜索他们，首先看到庆蓉，我看见她到处张望，叫了她一声，她和声、炜炜、家骅都笑着走了过来，只是没有见到其燕，我以为他在学校。在汽车站我问起其燕为什么没有来？庆蓉想说什么，我看见声用眼色制止了她，而且用其他话遮掩过去，我有些纳闷，但只想到可能是武斗才停不久，在人多之处讲起不大好，故未深问。

回到家我又问起其燕，他们都沉默不语，怀声和庆蓉都在流泪，家骅□到柜子里拿出一张纸出来，斗大的“讣告”两个字像铁锤一样飞进我的眼帘，啊！这是真的吗？死的就是我亲爱的其燕吗？我怎么能相信呢？我像做了一场噩梦那样可怕，噩梦尚有清醒之时，而他，我亲爱的孩子却与我们永别了。

我和他最后一次见面大约是在重庆已经战火纷飞之时，我说人家有枪啊，你们呢？他天真地说：“我们没得枪，但我们安得有电网。”我要他回来或走，离开重庆，他不干，说：“到这个时候8·15的都走了，谁来干革命呢？”恨我当时没能说服他或强迫他离开，谁知在战斗已停，却被一个可恶的疏忽，引起手榴弹爆炸夺去了他的生命，我是多么内疚啊！望着他的讣告，禁不住眼泪夺眶而出，孩子啊，你可知道我们是如何悲伤啊。（右为陈其燕遗像。）



你死得太冤枉了，也死得太年青了，还不到十八岁啊！你像一只学飞的雏鹰，正翱翔在毛泽东时代自由的天空，你正在经风雨受锻炼，但谁知晴天霹雳，把你轰了下来，你像流光一样，在人世只生活了短短的十七年就消逝了，永远消逝了啊！我多么恼恨那个耍手榴弹的小子呀。天啊！我们为什么会遇到这种不幸呢？万恶的走资派，和挑起武斗的牛鬼蛇神，不是你们这些坏蛋，我的孩子和成百上千冤死的人也不致于死，国家财产也不致于遭到这样大的损失，账要你们还，早迟点也要你们还，非还不可！

1967年9月30日

几乎是彻夜无眠，我总觉得其燕就坐在沙发上望着我笑，习惯地搓这搓那，总仿佛听见他生前和炜炜玩笑时的笑声和“妈妈，你看炜炜嘛！”那半认真半玩笑的声音，眼泪止不住要流出来。在柜子里找到了他毕业时的照片，我看到他那稚气的样儿忍不住心伤。

其燕的同学来了一些，当然她（他）们是想来安慰我们，可是这种损失岂是他们能够补偿的？看到他们也就想起其燕。唉，人生也不过是如此，我记起苏轼词中有这么一句“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似乎很难找到十全十美的。毛主席一家为革命牺牲了六口人，他死去了爱人和爱子，周总理没有孩子，比起来我们又算什么呢？

国庆节

从北京匆匆赶回，为的是一家在战后共庆国庆，共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可是谁知道我赶回来过这个最痛苦的节日呢？怀声说同学们三日要去其燕坟上，我多么希望去啊！

1967年10月3日

大概十点钟我们到了沙坪坝公园，我终于看到了其燕的坟墓，同学们对他很好，墓侧种了松，墓顶也种上了地口，墓也搞得好。可是睹物伤神，触景生情，禁不住失声痛哭，我怎么也制止不住我的悲伤，我只有让悲伤随着眼泪流去，流去以减少我的悲痛。在那垒垒黄土之下，就是我那亲爱的儿子啊！虽然，妈妈在你死后为你穿上了新衣，可是衣单被薄，你忍受得了那夜寒的侵袭吗？我们来看你，你是否也知道？你有什么话呢？你怎么不来梦中和我相见呢？孩子啊，两月分离竟成永诀，叫我怎么能不悲伤呢？连你最后的遗容我都没有看到，我怎么不想念你呢？我想你是不会太寂寞的，那里有与你在广播站共同战斗的邵大海，还有几十个8·15的战友，你们生虽不识，死后同埋一处也结了“鬼缘”。

在其燕坟前照了几张相，同学们弄了花圈，十一点多钟回来。心中想念他，凑成一副对联：

雏燕初飞前程似锦，正经风雨练羽翼，孰料晴天霹雳琉璃碎，痛汝归去何其早；

京城虽好非久留地，为庆佳节旋故里，谁知霁月云遮天地暗，恨我回来已太迟。

额为：寄我哀思。

10月6日

陈素碧她们把其燕的画像送了来，我选了一个画得比较好的，有点像他，但画得没有神气，呆板板的，暂时挂着，日后把五月份我们照的那张相给他放一张单相，那个相照得最好，就恍如本人一样。

几乎无日不为他而流泪。

10月7日

把其燕画像挂上了，把我为他作的对联也写来贴在相两侧，改了几个字：

“琉璃碎”改为“嫩翅折”，“痛”改为“叹”，“回来”改为“回时”。

晏殊词：“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可是我的燕却一去不复返了，伤哉，真是“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10月15日

今天是其燕牺牲一周月的日子，我昨天说到其燕坟上去看看，怀声不肯，所以作罢，我只在心里纪念他，愿他去地下安息。

.....

“彩云易散琉璃脆”，大多好物不坚牢，人也是如此吧！

10月22日

从杨端珍那里得知其燕死后还照了一张相，怀声不得已说相在家骅那里存着的。杨拿出她保存的那张来看，我尽力忍住了眼泪，可怀声却流泪了。他像睡着了觉似的宁静，只是眼有点肿，颈子好像长粗了些。这就是我其燕最后的遗相。

10月24日

他们都出去了，在家骅挂在柜子侧边的帆布包里拿到了其燕的相，我又仔细端详了他，又把他活着时照的相来看，越看越难过，在相片背后写了几句：

“燕儿啊！我怎么能相信你真的死去了呢？像一场噩梦那样可怕，噩梦尚有苏醒之时，噩梦究竟是幻觉，而你却一去不复返了，留给我的是无限悲痛！”

我想起他小时白胖胖的样儿，也想到他割盲肠后从手术室抬出来昏迷不醒时的可怜样子，记起他和炜炜打闹时的乐哈哈情况……这一切都成了幻象一样，消失了，永远也听不到他的声音，看不到他了。“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一江春水能流尽我的愁吗？“世事漫随流水，算来一梦浮生。”对一个人说来有什么意思呢？哪怕你有冲天抱负，一死还不是什么都完了。

10月31日

昨天上午到商店去了一下，看到他们正在写 412 红总被打死 32 人的大字报，看到街上 8·15 的广播站旗杆上挂着白花，一些佩青纱的解放军在写标语，不禁想起其燕，眼泪总要流出来。人的确无法预料到自己的生死，像这死的卅二个伤的七八十人，他们又何曾想到几分钟后就会与世长辞和受到枪击呢？

11月8日

上午财贸 8·15 总团召开“斗私批修，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大会”，梁司令员、中央调查组温伯华副组长、韦军长、白、雷、韩副军长、兰政委、耿参谋长、韩副参谋长、财贸指挥部空军侯政委、曹处长等均到会。梁司令员、温伯华、兰政委都讲了话，除支持我们这个会外，也提出斗私批修是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希望我们遵循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前进，温伯华再一次指出 54 军是有丰功伟绩光荣传统的好部队，革筹组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首长讲话一再为热烈掌声所打断。

.....

走到港务局大厦还碰上 26 中三个为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牺牲的学生家

长，许多学生护送着她们，我看到她们不由想起其燕，眼泪也不禁夺眶而出，我虽然尽量忍也忍不住，喉咙像塞住了什么东西那样难过，真是“咽喉哽哽”难受啊！一个中年女人被两个同学扶着一路哭泣，我想怀声在听到其燕不幸和参加他的追悼会时其难过的心情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这次重庆的武斗中听说双方死了二千多伤了七八千。这些死伤的人，大多是学生特别是中学生和工人，坏蛋和走资派都安然无恙，这些坏东西总逃不脱人民的巨掌的。

平哥一家除嫂嫂和小燕都来了，其瑶是要回兰州，他们是要去宜宾，说是看其英，因他“援沪”受了伤，也可能其忻要去成都结婚，反正他们不说我也不问。

11月9日

送平哥他们至汽车站买四十斤米，看到其燕那个讣告，想着他生前的情况又不禁哭了一场。其燕啊！你死了，一无所知了，可我们要何时才能忘掉这个锥心的伤痛呢？想给你放一张大照片，因这一向用钱较多而延缓下来，发薪后一定去放一个。

“花儿零落会再开，燕子飞去还回来”，我的燕儿是永远也不回来了，他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了啊！昨天开会后碰到熊仕兴，她说：“把我最喜欢的胖娃死了，我们都很难过”，燕儿啊，思念你之情真如李后主词所说“多少泪，断脸复横颐，心事莫将和泪说，凤笙休向泪时吹，肠断更无疑！”昨天看演出，当演奏“白毛女”至杨白劳念喜儿那段，那低沉悲凉的大提琴声唤起了我对燕儿的怀念，禁不住泪落，同坐的人以为我为音乐所感动，他们何尝知我另有所感啊！

1967年11月15日

每当发薪的日子，就不能不想起其燕，他已经离开人世整两个月了。两个月来他给怀声和我是多大的刺激啊！谁知他会在少年时期就夭折哩！可惜他的聪慧，可叹的是他死得那样冤枉，死得那样不明不白。

上星期五我曾到红岩三中去看他牺牲的地方，有学生指给我就是那篮球架都炸弯了的地方。我真恨那个小子，操场这么大，为什么手榴弹不向无人处而向有人的地方丢呢？这亦是其燕的命运吗？假如他早离开去吃饭，如果他不是背着身，或者那小子一边甩一边叫“来了来了”，他没有听见不跑几步……那不是不会出这个惨案吗？天啊！那真只是几分钟的差距，几公尺的远近呀！我那燕儿是多么不幸啊！

其燕，你是安息了，世间的一切你都不知道了，可是，我们心上的创伤何时才能泯灭呢？真是“世事漫随流水，算来一梦浮生”，你之死，的确像一场噩梦

那样，忽然而来，是那样顽固地铭刻在我心头，何时才了呵！你那爽朗的笑声，稚气的脸，落落不拘的举动，我再也听不到，看不见了，只有在梦中相见吧！

重庆今年因武斗直接间接死的据说是二千多，伤了七八千，这上万人的伤亡教训是沉痛的，但是否都认识到了呢？好像还有人并不甘心，总想再度挑起，近日来不是又有好些地方发生小斗吗！有人在大搞分裂，两个局两个公司各自为政，而且据说上面还有人支持呢，抽象肯定革筹组，具体否定其权力，实质就是要反夺权，也就是反红五条。不过有毛泽东思想指挥，有中央支持，我想决不会让其得逞吧！

1967年11月27日

两个月前的今天，怀着一颗回家团聚的心于早上七点多钟上了从北京回重庆的火车，一路上盘算着与家人相见的快乐，亦是战后分离后的团聚，亦曾想到今冬其燕的棉衣要另买了，去年他就只能披在身上，小了。可是，回家后迎接我的是无穷的悲痛，可爱的孩子早已在半月之前，离开了人世，父子俩最后一面也没有见着啊！

人总有一死，毛主席说为人民利益而死就重于泰山，其燕当然还够不上毛主席所说的“重于泰山”，但他是按照党和毛主席的教导办事，亦算死得其所吧！

11月28日

今晨八点半左右在车站接回了家骅、庆蓉和炜炜，庆蓉看来胖了一些，虽然经过两天火车行程疲劳，但他们都很高兴，当然，他们在昆明的生活情况已从所寄回的照片中看到了，是愉快的。带回来茶叶和白糖等。下午其瑾和孙波亦来了，家里又热闹起来了。

1967年12月27日

今天我随纵队一些同志去重大参加该校毛主席塑像落成和成立革委会大会，同时也要去看望我那与世长辞了的儿子。

到了重大，简直是人如潮涌、水泄不通，因为人很多，当然只有各自找个地方。我们听了黄顺义、周家喻的发言和梁司令员代表成都军区、省革筹对校革委会成立的祝贺后，我慌忙着要去其燕坟上看看，所以就走了。

到了坟园，一片叮叮当当的打石声，许多坟墓都改建了，都像原来那几座解放军的墓那样，墓标高矗，燕的坟比起来就逊色了。邵大海和张大英两人的墓合在一起，正在改修。其燕的坟有点小裂口，地口已黄萎，但比之钟永芳儿子的墓又好得多。碰到钟永芳，我们是“流泪眼又见流泪眼”，钟瑞清也和一些人去

其燕，她说：“老陈，你也来了？”我只“嗯”了一声，不敢多说，踉跄而返。

1968年元月廿七日（春节是29日）

忆其燕感而作联：

风景依稀似去年！

燕其归矣今何在？

想去岁合家团聚高高兴兴何其乐也，

念今朝燕居荒郊冷冷清清能不痛乎？

1968年2月1日（正月初三）

又当腊梅吐馨时，斜风细雨冷丝丝。

山城攘攘如鼎沸，我心戚戚凉于冰。

人生自古谁不死，但悲汝命太暂微。

十七年华成逝水，百载椿萱犹哭痴。

1968年2月4日

今日星期，原听25中的同学说，重大的国学要来，庆蓉又说陈鸿他们亦要来，故未出去。上午刘五林、杨端珍她们和一个不认识的女孩来玩，因听声说家骅他们出去是因我们要拖地板，她们就抢着做了，做了就跑了，我虽然买了几个黄饼回来她们也未吃。下午陈鸿几姊妹和郭君仲、小刘来玩了一阵，到四点多钟就走了。大概怀声看到他，想起其燕，又哭了。她恨那个“猴儿”何不自己去死。

那“猴儿”除夕来，送来二本马恩列斯和《毛主席语录》，一张画和一包什么东西，前者我收下了，东西给退了。那天我才问到他叫□□□（注：此处原件上有姓名，发表时略去），在石灰市十号住。我曾问了那天出事的情况，他说是手榴弹盖子没有，弹弦漏了出来而发生的。我责备他为什么不把手榴弹甩远点？他说当时周围有几十个人，来不及了，不丢出去，几十个人都要受损失，解放军伤的是7835部队的五个，现已经好了。可是我的其燕却作了无谓的牺牲品啊！

自春节以来，虽然要多于工作，但我的心情何时快乐过呢？我又怎么能高兴得起来呢？想到孩子的死我怎么能不悲伤呢？我真想去沙坪坝看看他啊！假如他仍活着，家骅、庆蓉、晓阳都在家，那是多么快乐啊！

2月21日

在街上看大字报，在解放碑的一些大字报上看到落写大字报的单位有东中《陈其燕》战斗队，我初以为看错了，的确是，而且不止一张，啊，我的心里是

多么复杂啊！对于其燕同学们的对他的怀念，他们没有忘记死去的战友而感动，也因此而勾起对孩子的怀念，不禁热泪满眶。孩子啊！如果你还健在，看到毛泽东思想已更深入人心，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已取得胜利，而且即将取得全面胜利，你是多么高兴，你一定会跳跃起来。不知你也能感到你的同学、同志、你的父母、亲人对你的怀念否？我多想来到你墓地来看你呀！

1968年2月26日

庆蓉、家骅和小熊小钟等今天返厂，和声去送他们直到进站后才回，祝愿他们回厂之后平安无事，也一再叮咛如有任何情况急速离开，不要去做傻事充硬汉，他们虽然答应了，但总有些不放心的。家骅说到后就发电报来，看他兑现不？

下午亦未去上班，转到三八商店碰上李芝兰，本不想谈什么，因为我知道她一定要提起其燕，但她已打了招呼就不能不回话。果然她说：“其燕，你们为什么不叫他回来呢？多可惜呀，好聪明的一个娃儿啊！当听说后，我们都很难过。他的同学说，广播站被围几天几夜都吃不上饭都没有出事，谁知在那里出事了。”我有什么好说的呢？我也怪自己当时没有强迫他离开重庆，而今追悔无及了啊！其燕：是我没有尽到责任，是爸爸对不起你，这也是我终身难忘的伤痛啊！

1968年2月29日

五个月前的今天，我快乐地回到重庆，惨痛地得知其燕牺牲的噩耗，真是晴天霹雳，震得我不知所以。如今，已过去一百五十多天了，虽然有时淡忘了一些，有时却十分怀念他，我想到生前有时对他似乎苛刻了一些。

在广播站开始没有意识到他经常出来有危险，强迫他回来吃饭。后来同意搭伙，也经常只给他几角钱，可是他从来没有争过，最后一次给他十元钱四十斤粮，据说他死时身上只有几角钱、几两粮，有些粮是同学们大伙一起吃了。他从来不挑饮食，偶尔要想吃什么也总是向妈妈说，我们同意才买。穿东西则更不注意，66年冬天和67年春，我见他老是把棉衣披着，最初还责怪他不应该那样吊儿郎当的，后来他才说棉衣小了穿不上。而且棉花本来是旧絮翻弹的，洗了之后，成了坨坨往下掉，确实不暖和，他也不计较。在北京就想今年要给他添制一件新棉衣，谁知我这想法永久也不能实现了。

我总觉得他好像是暂时离开我们到一个什么地方去了，他好像总是要回来似的。然而五个月过去了，他离开我们的日子越来越长了啊，他永远也不会回来了。

1968年3月15日

今天是其燕牺牲半年的时间，我怀着一颗沉痛的心悼念他。下午我想到红岩

三中去看看他牺牲的地方，然而虽然到了凯旋路口，我也总无勇气进去啊。真是“凯旋路口伤心地，身虽到此脚不前”啊！燕儿啊！你如有知，亦能来安慰我一下吗！？

3月24日

十八年前的今天早晨，在晨光曦微中，你呱呱坠地，来到了解放不久的新中国。我们庆幸你不再看到那万恶的旧社会那种肮脏、残酷的人吃人的世道，庆幸你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的新中国健康地成长。

记忆是那样深，那样清楚，你出生的时候，由于重庆刚解放不久，夜晚还戒严，你要出世了，没有去医院，是你的保保（注：巴渝民间习俗为小孩拜继的千爹千妈）刘咏梅和吴惠文把你接引到人间来的。

尚记忆犹新啊，正当我在走廊生火烧水时，你，我亲爱的孩子发出了来到人间的第一声呼叫。在襁褓中，你圆圆的脸儿，小小的酒窝，鲜红的小嘴吮咂着妈妈奶水时的样儿；在春天阳光下，在走廊上蹒跚爬行的可爱姿态还历历在目；也记得你有一次踩着热炭，你那肥圆的小脚烫得直跳，又哭又叫的天真样；在托儿所，你对阿姨是那样热情，常常拉着阿姨的手团团转，托儿所的评语是反应快、活动力强、对人热情；你上学读书了，从小学到初中九年中，你虽然有些调皮，可是功课却还可以。

由小学到初中，几年时间轻轻过去了，你也由一个毛孩子长成为一个少年。66年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了，你偷偷地参加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投入了伟大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你也曾怀着一颗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比敬仰的心情，去到世界革命的中心，我们伟大的首都北京，你在毛主席最后一次接见中，幸福地见到了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也在你写回的信中分享了你的幸福。

之后，你一直在学校里搞，有多时间是住在学校，我们也不知道你是你们学校革造团的头头之一，我们心目中的你毕竟还是一个不大懂事的孩子啊！67年夏天你开始在外面活动，先去七星岗广播站，后又到东方红。在那战火纷飞的七八月，我要你回来或离开重庆，你不答应。考虑到你的安全，经常回家吃饭容易出问题，我们带给你一些粮票和钱。（后来才听说你曾几次被人盯过梢。）

在八一五周年之日，我因事离开重庆到北京，妈妈和炜炜为避战火去到大足，留下你一人，我是多么不放心呀。临走的那天上午我还去找过赵民中，希望他去，我不走，由于他已经回家，所以我只得走了。

八月十八日，我到了北京，可是自此以后火车、邮电均不通，北京亦然，我却如困愁城。直到九月十一日与妈妈接通电话，我问起你，说你很安全，我是多

么高兴呀，我想停战了，不会有什么问题了，十分放心了。

在北京工作完了，虽然国庆节转瞬就到，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啊，真想在北京欢度国庆，然而急于与你们相见的心更迫切，所以决定节前回来。九月廿六，就是谢胡等阿尔巴尼亚贵宾访问我国到来那天，我们上午去买了些腊肉准备当天或次日去买火车票。

中午回到招待所忽然接到商店胡宗铭一个只问我“何时回渝”的电话，我只在猜想可能商店出了什么事吧？决定当天去买车票。由于迎接贵宾戒严，我买了票，无公共汽车，只好从前门步行到德胜门招待所。

九月廿七日在汽笛长鸣声中我离开了伟大的祖国首都。经过两天多的行车，廿九日上午回到离别四十天的重庆，看见了车站上的妈妈和姐姐、炜炜、家骅他们，我有点猜疑，但万没有想到你已经在我回渝之前半个月就离开了人世了啊！你哪里知道我回到家里，得知你牺牲的消息时，那无法忍受的痛苦的心情是无法形容，是笔墨所写不出来的呀！你的不幸也造成了我们的痛苦和不幸啊！在一段时间里，哪天不为你而伤心，何日不为你而流泪啊！记得在北京大约是在中秋前后一个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坐在地上的一片席子上，揭开席子看到一只鞋子露了一点在外，大部埋在土里，难道这就是不祥的征兆吗？

时间过去半年了，可是每个月的十五日，就是我难忘的日子，我很希望我们不在十五日发薪，以免触起我的思念，否则我忘不了你呀，我亲爱的孩子啊！

在你十八岁的日子，如你还活着，虽然买东西不易，也一定要弄点你喜欢吃的，买点你喜欢的东西给你。可是你现在离开了我们，躺在那荒郊的坟园，你可能已形销骨化成了泥土一无所知了。可是我怎么能忘，怎么能忘得了你啊！你实际上是屈死的呀！由于无车，在你冥诞之日，连看也不能来看你一眼，我多么内疚啊！

我们曾经有过一些幻想、美梦，由于你的死，庆蓉辍学，炜炜眼睛不好而吹了，至今之后，只有让炜炜身心更健康地成长而已。

人生也不过几十年，可是我好像是算“多舛”之类吧！十岁多死了亲爱的母亲，不到十三岁我就为生活而跨进了“社会”，不久我就背上了“缴家”这个包袱。解放了，我们一天天好了起来，在政治上工作上没犯什么大错误，可是谁料到你会在我们这种年龄时死去呢？

我今天这样地思念你，你如有知，亦一定会想念我吧！在我回渝之后，就想把去年五一节时照的合影中的你，放一个大单相，可是这几个月，好像要拿几元钱来都有点紧，所以蹉跎至今，是我对不住你啊！

安息吧，我的孩子。

3月25日

庆蓉今天满二十岁，我十分怕因她过生日而提起其燕，使怀声不好过，所以说话都十分审慎，有时我就不说话。给庆蓉买了件浅蓝色绒线背心作礼物，看来她是很满意的。

四月五日

昨天忽然听到五娃子她们说：“明天是清明，清明菜好吃”等等，使我才知道已到清明了。想去其燕坟上看看的心情也更切。大约九点多钟我去怀声公司和医院都没有找到她后，就仍然决心去沙坪坝，因为我曾从井口走路回城，路不是很远。

十点多钟刚走到福民面粉厂就听到一排清脆的枪声，行人都惊了，我也暂时停下不走，但又没有声音了，和一群人又往前走。到了嘉陵印刷厂附近才知刚才有一辆车（后来才知是四十中昨天去安葬他们勤务员今天回校）被人用枪打了，人们纷纷说看流那么多血，那么远（直到上清寺附近），一定不止一个而是好多个。下午回城看到大字报说是四十中学生和重大学生死三伤八，这真是莫大的冤死和不幸，是用血来纪念他们的战友和清明啊！

十一点多钟我到了沙坪公园，坟园里大变样了，矗立高耸的墓碑可谓“林立”，还有石工在那里改建。其燕的坟依然如故，上次看到的裂口也未扩大，坟顶上的地口好像有了点生气。由于是清明，来的人不少，许多坟上都放上了花圈，我没有带这些东西。在沙坪坝曾看到陈素碧和杨端珍等三人，可能她们也是来看过。很多人看了墓碑都说：“这次死的青年人好多啊，可惜了！”

我一个人在其燕的墓前伫立了很久，我想起他生时，有时见到我们回家时手舞足蹈的欢乐样儿，如果他活着，一定很远就会跑来接我了。如今我和他只隔着一层泥，却是在两个世界里了。我想到不久前看到的鲜血而想到他受伤未死时血流如注时的惨象来……其燕呀，你是多么不幸啊，你的父母也是多么不幸啊！刚好把你抚养成人，正像一个离娘的乳燕那样开始独自生活时，晴天一个霹雳，是真正的晴天霹雳呀，把你毁灭了。时间如逝水，你整整离开我们二百天了，多么难忘而又难过的二百天呀！

唐诗说“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我读这几句诗时是读起来好听，现在我才真正体味到“欲断魂”的滋味，非笔墨所能表达，非言语所能形容，心痛不已啊！

4月26日

宿命论说：“死生有定”，当然是迷信话，不过这一阵好像“死人”成了普通

的事了，成了毫不值得惊奇的事了。听怀声说，李芝兰的大儿子在体育馆被打死了。今天我又问了赖光蕊，她说：是的，这孩子是反到底的，他一个同学在体育馆不回家，这个同学的母亲不放心，叫建设去叫他儿子回家，谁知刚到体育馆，一颗流弹就送了他年青的生命。李芝兰的爱人还不知道哩！记得李芝兰曾对其燕之死感到难过，谁知她亦碰到和我一样的不幸呢？曾经在托儿所和其燕合得来的吴若愚的孩子前年淹死了，刘建设被流弹打死了，其燕亦死于非命，三个都是聪明的孩子，都不得好死，岂不令人痛惜！

1968年5月3日

去年今日是其瑾和我们一起照相的日子，也是其燕留下的最后的一个遗容，很早就想给他放大一张相片，好像什么钱都用了，就是舍不得花那几元给……
（录入者注：以下缺失七页）

1968年9月17日

其燕于15日离开我们就整整一年了，一年来有多少时间都在怀念他呀，我总以为他并没有死，只不过外出未归。当然现实是他永远也不会回来的，他可能已经骨化形销成了尘泥了啊！明天南中革造团要给他开周年纪念追悼会，中午回来就在街上看到他们贴出的讣告，有他去年五月份最后照的那张相片，看到了真使人难过，睹物伤情，眼泪总忍不住啊！其燕啊，你亦知道我们的悲伤吗？真是如春节我所写的那样“十七年华成逝水，百载椿萱犹哭痴”，父母是痴心的啊！

在他周年之日写了几句，录如下：

一、一年容易又秋风，喜看祖国一片红。

多娇河山添新彩，主席思想通九州。

二、文化革命烈火熊，七亿人民竞冲锋。

资修毒瘤连根铲，革命儿女建奇功。

三、命令九五下渝州，忠于革命把枪收。

晴天霹雳传噩耗，凯旋路口天地愁。

四、死别生离总堪愁，每逢十五思悠悠。

忠心耿耿余碧血，红岩新冢葬群雄。

五、此生痛事知多少，燕随黄鹤逝东流。

恨不其时坚阻汝，轻轻断送十七秋。

1968年9月18日

从昨晚十时左右就秋雨潺潺不绝，因为今天南中开其燕死难周年追悼会要写

个发言稿，写了之后，追忆其燕思潮不静也是几乎彻夜不眠。想到其燕从初生到死的一些情况，像电影一样历历在目，眼泪也难禁，真是“枕前泪共窗前雨，隔个帘儿滴到明”啊！

原以为同学们要来和我们一道去，但看到大雨到十点都未止，以为可能是改了期，十点过刘五林等来到家里，才一道去。怀声昨天是为想念其燕眼睛都哭肿了，也不愿去，怕再触景伤情。我和蓉、炜、家骅去了，到校才知他们已经开了一次，我们去了，又开一次。

人不太多，大约四五十个，他们念了悼词、讣告和其燕生平介绍，战斗团、东方红战斗队、南民中的同学发了言。我在发言时虽然竭力要抑制住内心里悲痛，但咽喉哽哽，眼泪夺眶而出，念到我去年特地放弃在北京过国庆而赶回重庆，得到的是他不幸已牺牲的消息时，忍不住失声痛哭了，有什么办法啊！“百载椿萱犹哭痴”，做父母的是痴人啊！

9月29日

去年今日，我满怀高兴回到重庆，可是迎接我的是看到其燕死难的讣告，听到的是其燕已离开人世的惊人噩耗，真是给我当头棒喝啊！当时我好像痴了，难道这是真的吗？我多么希望这是讹传啊！直到如今，我犹以为他只不过是远出未归，希望他有一天能回来呀！如果真有“聊斋”上起死回生的事，哪怕他是一个鬼，我也愿意他回来啊！然而无情的现实，否定了我的一切幻想，他，我最亲爱的孩子永远也不会回来了。新坟垒垒，一土之隔，人天两异，永不再见了啊！

.....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背着我们参加了红卫兵造反司令部，以后一直在学校搞，后来到广播站。我们的好心是怕他不在外不回来，一天只扣着给他三角钱，有时回来为要三角钱，我和怀声还训他不节约。他只讷讷地说：早上吃六分，午、晚吃二角四嘛！

虽然我们环境并不困难，可是对他也太苛刻了，后来才知道为了三角钱，回来的路上是有风险的，几次被人盯梢，我们的敌情观念太薄弱了，对他是不够关心的。只有后来了解到他的处境之后才给了他差不多一月的粮和钱，叫炜炜送到他广播站，至此以后我就没有见到他了。

大约是去年七月底八月初，他托一个女同学来要钱要粮，我们给了他四十斤粮十元钱并带去一些衣服。八月十三日交电公司烧后，他们也撤走，我们不知他的行踪。

十五日我离渝到北京，怀声和炜炜到大足，此后便是半个多月音讯不通。知道我回来，回到家里才知道他，我那可爱的孩子已经死了。他死得那样突然，他

等于是被那个□□□（注：原件有姓名，发表时略去）暗害死的，死时连最后一句话也没有留下。

我想到他突然被手榴弹击中而未死时一定是非常痛苦的。据说当时他只是嘴唇动了几下，可能是连呻吟的力量都没有了。其燕啊！你死得太年青，太冤枉了，你、我、你的妈妈谁也不会想到你会在严重的武斗停止之后，会遭到这个万恶的□□□（注：原件有姓名，发表时略去）的毒手啊！你如有知，恐亦会含恨于坟下的。

你死了，一切都不知道了，可是留给我们的不幸的思念，不知要何时才能忘掉啊！

九月卅日

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形势逼迫不能再拖，公司所有商店在昨晚二点半左右达成了大联合协议，虽然迟了一点，但总算联合了。当然，现在只是组织形式上的联合，思想上的联合可能还有一段时间。今天一上班，气氛就有所改变，派性的标语撕了，大联委的牌子挂出来了。上班后就搞店堂布置和写喜报。两派选出的委员是李瑞昌、颜惠民、王桂荣、傅书刚，仍然是原来8·15那套班子，不过后两人是反到底的成员而已。

.....

在中午回家时碰见李芝兰，人瘦了，老了一头。她说她的儿子可能是被人暗害的。他本来是反到底的，因为看不惯那些人搞打、砸、抢，所以很久未参加活动，所以遭人之忌被下了毒手。这是他儿子死后，他的同学说的，说是有人早就对他儿子不满意了，曾叫他儿子注意。我们是“流泪眼观流泪眼，断肠人看断肠人”，只劝慰她别过于哀伤而已。

1968年10月6日

今天是中秋节。一年前的今天（录入者注：指1967年9月18日中秋节）我还在祖国的心脏——首都北京。记得那天晚上，上半夜是晴空一片万里无云，一轮皓月当空临照，我还在六铺炕百货店买了一包大前门香烟，卖糖果的柜台，挤得水泄不通，是北京的人们在欢度中秋。

我一人在马路上踽踽独行了一阵，回到招待所给怀声他们写了一封信，开头我记得是写的“身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以后又谈到不要其燕参加武斗，说通车后就回渝。写信时我虽然怀念家人，但因已知全家平安，所以心情还是愉快。我那时哪里知道去年今天是其燕死难的第三天（去年是9月18日的中秋），怀声他们是以什么痛苦的心情来度过那个可怕的节日的呢？我难以想象，

也不愿去想啊！

一年，轻轻地溜过去了，而记忆是多么深刻难忘啊！第一次在北京呆那样久，第一次在北京过中秋节，第一次的文化大革命，第一次大规模武斗……都是终生难忘的啊！而且更不会忘记的是去年中秋节前三天，我失去了一个亲爱的儿子，亲骨肉啊！

“九月秋风劲，雏燕倏凋零。明年花发日，顾景只三人”。明年其燕生日时，家骅、庆蓉当早已回厂，就我和怀声、炜炜，多么冷清啊！

今年的中秋，我们是除了其燕之外，大团圆了，家骅、庆蓉、永榆都在家，还加上其瑾。明年呢？谁知道。曹雪芹大概是身世经历多舛的，所以假林黛玉之口说：“三月香巢初垒成，梁间燕子太无情，明年花发虽可啄，却不道人去梁空巢亦倾”。

我虽不是如曹雪芹那样颓废，可是自其燕死后，精神上的痛苦在一段时间内可能亦是悲观的，不健康的。大概也是受了点李商隐“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之类伤感句子和李后主所写的词的影响。李后主的“虞美人”“浪淘沙”之类的调调，我很早就学，记得很深，也可能中了些流毒吧！也可能是我这个半知识分子作茧自缚。所以，每当听到唱“我失骄杨君失柳……”也不禁感伤泪落。

去年今天晚，下半夜却下了一场倾盆大雨，我记得同寝室的都已鼾鼾入睡，也许已在梦中与家人聚会了，我却睡不着，站在窗前看豆大的雨滴落在北方的灰沙上烟尘滚滚，听雨点打在行道树——白杨叶子上飒飒的声音。记得大概是二点以后才上床朦朦胧胧睡了一阵。今年重庆根据天气预报，可能有雨，而且有月蚀，当然，白天就阴沉沉的，晚上也不会见到月亮了。

【编读往来】

阎长贵谈 34 期金春明文章

《昨天》34 期“热点研究”栏目所选《文革时期的毛泽东和江青》，确实是一个热点问题，因为“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文化大革命，同时文革也刻有江青的痕迹和印记”。金春明教授大概是最早研究文革的人。他这篇文章对“文革时期的毛泽东和江青”，讲了他自己的观点和他所了解的史实，对深入探讨这个问题都有意义。我认为，这篇文章不论观点还是史实，都有些可商榷和讨论的地方。比如，他说江青欺骗和封锁毛泽东对不对？毛泽东要和江青“分道扬镳”的批示究竟有没有？等等。希望“热点研究”栏目有更多对文革热点问题的研究和争鸣。

蒋健对 34 期金春明文中一处提法的商榷

金老的文章提到林彪在刘少奇蒙冤一案中的作用时说：“在陷害刘少奇这件事情上，林彪、‘四人帮’的阴谋是得逞了的。无怪乎林彪知道毛泽东批准了专案组关于刘少奇的诬陷报告之后十分高兴，特别批示：‘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这当年留下的两个阴谋集团狼狈为奸、互相吹捧之词，今日却成了江青指挥炮制共和国最大冤案的铁证。”此说可商榷。从王力和刘少奇原秘书的回忆可以看出，林彪对整治刘少奇谈不上积极。而且现在还有新的材料可澄清林彪批示一事，当事人李根清所写的回忆《我仿林彪字体批文件》（《炎黄春秋》，2014 年 2 期）中回忆到 1968 年 9 月中央专案组向中央上报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和江青的批示后说：“林彪听秘书讲过这份文件后，并没有任何表态，只是在空中比划了一个圆圈，意思是同意。”“按照叶群的规定，没有经过她把关，传阅文件是不能退走的。不经她认可，林彪的任何表态都没有用。所以，这份文件也必须等候叶群的最后裁决。”“叶群来了，询问文件办理情况。那段时间专案材料由李春生负责报告，当叶群听说林彪只是表示划个圈时，便立即惊叫起来：‘怎么不提醒首长呢！这是十一楼（指江青）亲自挂帅的专案，是中国第一大专案呢！主席非常重视，十一楼亲自抓，人家多大的功劳啊！大家都表态了，首长怎么能只划一个圈呢？’接着，叶群就喊：‘李根清，过来。’等我走过来，叶群已经替林彪想好了批语：‘完全同意，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准了在江青指导下写成的关于刘少奇所谓‘罪行’的审查报告，给刘少奇戴了‘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错误地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与此同时，林彪向制造这一冤案的罪魁祸首江青‘致敬’，也被永远地载入史册。不过，应该申明的是，由我替林彪写在文件上的批语就只有那么一句。”

金老写文章时显然还不知道李根清这个回忆所揭露的真相。

晓星谈 34 期金春明文章

拜读了《昨天》第 34 期金春明教授的《文革时期的毛泽东与江青》，金教授是正统的学者，行文严谨，言必有据，觉得不足之处是过于迷信政治家的公开讲话，仍未摆脱“政治正确”的桎梏。文章中最让人难以苟同的是，他认为在将刘少奇定性为“叛徒”这一重大问题上，毛是受了江青一伙的蒙骗。江青确实利用

文革动乱搞了点小动作，无非就是派人去上海查抄一些明星的家，以及残害孙维世等等；然而在对待刘少奇定性这样的重大问题上，她是决不敢擅做主张的。毛固然不可能“洞察一切”，但在如何处理刘少奇一案上，他是心明眼亮，处心积虑，谁也不能违背其意旨的。那些被打入笼子的高干，一举一动都在他的掌控之中。关于这一点，徐友渔先生在《昨天》32期那组“文革反思录”中已经讲得很透彻了。江青之所以要竭尽全力将刘的“叛徒”做成铁案，正是因为她明白毛的意图，仅就此而言，她不愧为毛的好学生。

仅凭“路线错误”等等，是不可能致刘少奇于死命的；只有抓住“变节自首”这类把柄，才能让刘少奇“永世不得翻身”。这个道理，普通百姓都明白。近年新出的史书中已有透露，早在建国初期，毛就指使高岗去查东北的敌伪档案，了解刘少奇在二十年代被捕的情况。说毛受了江青的蒙骗而误信刘少奇是“叛徒”，那是大大贬低了毛的智商和才干。

金教授引了一段胡耀邦1981年接见外宾时的谈话。胡耀邦的话也不可能“句句是真理”，何况他当时已是中共主要领导人，在公开场合讲话要注意分寸的。将文革的罪责推给林彪、江青一伙，使毛泽东相对干净地解脱出来，这是中共中央关于文革决议的基本宗旨。胡耀邦怎么会违背这个宗旨？政治和学术终究是有区别的。搞政治的讲究“权变”，推崇“适时而为”，有时明明知道是假话，硬着头皮还得说。搞学术的则要以“求真”为最高宗旨，要善于透过表象去追索真相。同样道理，这篇文章中引述的邓小平的那些话，也只能作参考，不能当做学术研究的出发点。